

和平建國

中華日報叢書之一

社評集

第一輯



MG
D693.09
1059
2



3 2285 3373 7

如何打破循環論？

明
庚

汪先生說：『數年以來，中日關係所以不能改善，且日趨於惡劣，係誤於循環論。』一方面說，你要這樣做，我纔那樣做；另一方面說，你要那樣做，我纔這樣做。彼此都要對方先做，彼此都不肯自己先做，於是終於兩方面都不做。不做的結果是怎樣呢？只有一字訣，是『拖。』拖的結果是怎樣呀？只有一字訣。是『打。』當七七事變八一三事變相繼發生的時候，張羣曾慨歎的說道：『陽差陰錯打起來，拖泥帶水打下去。』這實在形容得盡致。須知道何以打起來呀？是因為拖。何以拖下去呢？是因為循環論。

以前的事，誤於循環論，無可疑了。現在怎樣？可不是又要誤於循環論？

去年十月，國民參政會在重慶開等二次會議的時候，陳嘉庚在星加坡打一個電報來，說道：『公務員在日本軍隊未完全退出中國以前，不得談和平。』這個電報，本很滑稽，可是有共產黨及捧共產黨的人，熱烈的加以贊成，恰恰又碰着蔣介石正發表一篇什麼『告國民書』，說武漢失陷，廣州失陷，極可樂觀，因為這是最後勝利之開始，於是乎共產黨及捧共產黨的人，更覺得勢，非把這個電報全文通過不

53023

可。然而國民參政會，到底還有幾條硬漢，左舜生，羅隆基，余家菊，梁實秋，相繼表示反對的態度，使這個電報，終於含含糊糊的擱了下去。

陳嘉庚呢，不用說，可是負著軍事統帥責任的蔣介石，不也是說：『日本軍隊須撤回至蘆溝橋事變發生以前狀態方可談和平』麼？最近負着行政首長責任的孔庸之，不也是說：『日本未將軍隊在中國全部撤退以前不得談和平』麼？一方面說：『你要承認我所提出的關於和平的原則，方纔談得到撤兵，』另一方面說：『你要撤兵，方纔談得到和平。』可不是又來一種十足的循環論。

我以為日本應該知道，既然要恢復中日和平，鞏固東亞和平，則撤兵是必須做到的事。中國應該知道，怎樣纔能撤兵呢？換句話說，是撤兵纔得到和平呢？還是撤兵纔可以談和平呢？如果兵已撤了，則和平已經得到了，還談什麼？所以撤兵纔得到和平，在理論上是對的，說撤兵纔可以談和平，則不但事實上不可能，連論理上也不對。

撤兵不外以下兩個結果：其一是戰勝，其二是講和。戰勝之後，日本軍隊都趕走了，用不着談。既然用得著談，自然不是指戰勝的結果，而是指講和的結果。庚子之役，八國聯軍，佔領北京，其後因李鴻章談判的結果，辛丑和約於以告成，聯軍相繼撤退，只根據和約，酌量留些軍隊，駐紮平津，便是最著的例。假使當時西

太后躲在西安。也如今日蔣介石躲在重慶一般，高喊着非八國聯軍撤退之後，不得談和平，則北京談判，無從開始，辛丑和約，無從告成，撤兵也就遙遙無期了。

如此說來，『不撤兵不談和平』這句說話，從理論上事實上都不能成立的。我們今日所應該注意的，是怎樣纔能得到撤兵，怎樣纔能得到和平。

關於此點汪先生指示我們是：『中日兩國應該有一個共同努力的目標，以同時著力，』這是打破循環論的方法。在日本一方面，既然聲明對於中國沒有侵略的野心，則撤兵便是一個絕好的證據。中庸有一句語：『無徵不信，』這是科學的名言，也是道德的最高信條，日本只要有徵，中國自然相信。在中國一方面，既然知道日本沒有侵略的野心，便應該立即向日本提出停戰，由停戰而講和，由講和而得到無礙於獨立自由的具體條件，撤兵條件，自然在內。這樣一來，循環論立即打破。

有人說道：『日本有誠意嗎？』須知道誠意不是片面的，而是雙方的，應該同時的我有誠意，你有誠意，不應該分先後的。一定要你有誠意，方纔我有誠意，不然，便又陷於一種循環論了。

拖

華嚴

一言而喪邦有諸？曰：有之，拖。

九一八以前，中日懸案沒有勇氣來解決，決裂麼？估計自己力量，實在不敢；妥協麼？顧慮所謂國際觀感，所謂國內空氣，又實在不敢。那有什麼法子呢？拖。這是當時的行政院長蔣先生唯一祕訣。

九一八以後，蔣先生應付的辦法仍然是拖。及至蔣先生辭職了，一篇告國民書，說來說去，他的辦法仍然不出一拖字。淞滬停戰協定，塘沽停戰協定，當時的行政院長汪先生有意思作進一步的解決了，然而左牽右掣，仍然不免於拖下去。

五全大會以後，蔣先生復任行政院長，二十五年那整整的一年之內；拖字訣充分的發揮了效用；關於三原則，說是承認又不是，說是不承認又不是，看了當時的外交部長張羣先生和日本大使川樾先生的談話紀錄，真真拖得有聲有色！一般人不去追求日本所以不出於決裂的原因，見這樣的拖法居然的拖了一年，不免搖頭晃腦的以爲拖之一字果然有無窮妙用。加以這一年中，成都事件，北海事件都淡淡的過去，一般人更以爲拖之一字是不二法門，無上法門；不但淞滬停戰協定，塘沽停

戰協定，當時不能懂得用拖字訣，以至於此（！）尤其所謂何梅協定，當時如果懂得用拖字訣，包你比成都事件北海事件還要輕描淡寫的便可以過去（！）說來可憐，拖字訣從此便變了質了。在採用拖字訣的當初，原是出於畏敵的，後來則一變而為玩敵了。所以當初用拖字訣的時候，還有些小心謹慎的，到後來則越用越大膽起來了。二十六年五月間，中央紀念週談話會裏對於日本經濟調查團的態度，覃振先生站起來說：『日本就算有天大的要求，原是試試的，你理他，你便上當了；你不理他，他只好沒精打采的回去。』大家稱歎以爲至當不易。張繼先生更站起來說：『日本上天開價，原準備我們落地還錢，這一回要拿去年成都事件，北海事件的態度來應付他，切不可又上何梅協定那樣的惡當』。汪先生站起來說：『不要說何梅協定，說汪梅協定罷！因爲那時候兄弟是行政院長，應該由兄弟負責的』。於是乎經濟調查團果然沒精打采的回去了，而蘆溝橋事變也就爆發了！

在蘆溝橋事變的當初，蔣先生還是捏定拖字訣，以爲可以拖下去的。然而這拖已不是因畏敵而拖，而是因玩敵而拖了。以此之故，他要借這事件大出風頭，恰巧有廬山談話會，他便就談話會中宣佈這是最後關頭。詫異得很，這樣關係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和戰大計，蔣先生何以不先回到南京，召集中央會議，按著報告討論決議各種法定程序，使這和戰大計成爲國家的決定，不是個人的決定？蔣先生何以輕

輕易易的由他一個人在避著勝地的廬山名流集合的談話會就決定宣布起來？蔣先生置政治最高指導機關的中央會議於何地？置約法上賦與和戰大權的國民政府於何地？哈哈，蔣先生心目中無中央會議無國民政府久矣；但這一回如此的輕率決定宣布，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使用他的老法子，拖，而且加上了爲玩敵而拖。他以爲這一回定然不會決裂的，如去年的北海事件成都事件一樣，落得大出風頭，就近可得談話會中諸名流一致拍掌，何況共產黨總得還會稱贊他能實踐西安的諾言呢！這便是中日戰事一發不可收拾的最大原因。

抗戰以前，對日交涉以拖爲本，並且由畏敵的拖進而爲玩敵的拖，如上所述；及至抗戰以後，由交涉手段變爲戰爭手段了，可有什麼戰略戰術呢？說來可憐，仍然是拖。

蘆溝橋事件原是限於北方的，吾國兵力不敷，即使抗戰，限於北方，未爲非策；然而當時卻要『全面抗戰』，一定要使蘆溝橋事件延長而爲上海虹橋事件。爲什麼呢？中國的幅員了不得的大，全面抗戰，可使日本兵力不敷分配。以後焦土戰爭擊戰的理論都是從此出發的。因爲中國的幅員了不得的大，所以土地焦了一塊又是一塊，蠻不在乎；因爲中國的幅員了不得的大，所以游來游去，更蠻不在乎。除了『全面抗戰』之外，只有一個名詞是『長期抗戰』。全面抗戰是空間的拖，長期抗

戰是時間的拖。因為中國的幅員了不得的大，所以蔣先生和他的得意部下陳誠先生會說出以『空閒換時間』的妙語來。上下四旁曰宇，古往今來曰宙，空閒是有盡的，時間是無盡的，他們卻妙想天開的想拿空閒來換時間。假使孟子復生，定然點頭微笑道：『聖之拖者也』！張羣先生慨乎言之：『陽差陰錯打起來，拖泥帶水打下去』。何止拖泥帶水而已，這樣拖法，會把整個中國拖得如泥牛入海，無影無蹤。

去年十月，廣州失陷，武漢繼之，國民參政會第一次開會，許多參政員如周炳琳先生等，對於和戰前途都有重新檢討的熱烈表示；接着長沙不戰焦土，更引起許多人的憤慨與悲痛。可是聰明的蔣先生卻看出了日本無意再大用兵，這於他的拖的老主意，可說是正中下懷，所以十二月九日回到重慶，縱然汪先生等已知道近衛將有聲明，力勸宜乘此機會結束戰事，恢復和平，而蔣先生總是支支吾吾的。十二月十二日舉行紀念週並紀念西安事變，在行營招集中央委員及文官簡任以上武官少將以上，請出國民政府主席林先生做主席，蔣先生自己做報告，大聲的說：『以前十八個月丟了九省，以後十八年不再丟一省；以前五個中國兵打一個日本。以後一個中國兵打五個日本兵』。從此之後，安居重慶，今日說總反攻，明日說總反攻，明知日本除飛機轟炸外，不會有軍隊來到重慶，樂得坐在地下室裏唱高調。海南丟了，他說妙極，『這於中國不關痛癢，倒是英法受了威脅』。自然汕頭也是這樣。

南昌呢，可不是又一省了？然而他不會因此面紅的。總而言之，自今年正月以迄於今，蔣先生算是著著實實的享了拖字之福，食了拖字之賜，難怪他「抗戰到底」，「最後勝利」格外叫得震天響了。忽然的日本統一軍權的消息來了，方纔嚇了一跳；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他除了守着拖字訣之外，大約不會有其他什麼應付的。

拖之一字，使中國不能和，不能戰。以前使中國不能和，而又不能戰；如今使中國不能戰，而又不能和。中國地雖大，人雖衆，禁不得這樣拖下去的。

國是與黨見

學文

我們有一個中心主張，用最簡明的語句來說，就是『戰則全面戰，和則全面和』。

蘆溝橋事變起來之後，我們認爲中國的抗戰，無可避免，我們便一致主張抗戰，而抗戰必須盡全國最大的力量。抗戰兩年，國際的援助不可靠，軍事的失敗不可救，經濟財政的危機不可挽。我們便堅決主張講和，而講和必須求全國一致的瞭解與贊助。

我們反對以無可再戰之戰而亡國覆種。我們便冒危難，排衆義而主和。我們一樣反對以支離滅裂的和而講和。換句話說，如果和平足以陷中國於支離，亡中國於破碎，我們是痛心的，不獨痛心，而且必加糾正。

因之，無論重慶方面怎樣的誣蔑，說我們東不成，西不就。也無論淪陷區的民衆怎樣的期待，望我們速執政，早成功。我們仍然一貫，仍然不動，從事於喚起全國民衆瞭解，促成各方人士合作的和平運動。我們希望做到『和則全面和』的地步。我們的心目中，只有國是，沒有黨見。

在積弱中，如不是集合各民族各黨派各職業各階級的力量來戰，則戰必不能至兩年之久。在戰敗的中國，如不是集中各民族各黨派各職業各階級的力量來和，則和必不能達到軍事復員，社會安定，國家復興，民族繁榮的目的。我們的和平運動，本於這種精神與宗旨而邁進。我們不獨沒有黨見，抑且沒有急功。

彼以黨爭與內戰的心腸來作外交政策的權衡者，必陷國家民族於支離破碎的境地，萬劫不復。彼以黨爭與內戰的心腸而作戰，戰不過用以剷除異己，培植私軍。彼以黨爭與內戰的心腸而言和，和不過用以操縱把持，排擠傾軋。戰而無誠意，故戰足以亡國。和而無誠意，故和也足以亡國。我們反對這樣的戰，也要糾正這樣的和。

在外無救援，內有共禍的今日，敗戰之殘餘，滅亡之前夕，祇要有理性，祇要有誠心，必當披瀝衷腸，共謀挽救。因之，我們呼籲國內有國是而無黨見者一體合作，相期無違。同時，我們反對有黨見而無國是者，又要把中國陷於戰無可戰而和亦無可和的支離滅裂的深淵。

和平運動之如是我聞

思平

『以應付內戰的方法來辦外交』，這就是蔣介石氏的外交絕技，也就是中日戰爭之一重要的原因。你們說蔣先生是抗日，蔣先生何嘗真是抗日；無論在八一三以前，或八一三以後，直至於今日，蔣先生何嘗一時一刻放棄對日和平的願望。你說蔣先生是聯俄容共，蔣先生何嘗真是聯俄容共；他自西安事變以後，受了共產黨的劫持，何嘗不懷恨切齒，隱忍而不敢發！他的策略，就是『挾日以對俄，挾俄以對日』。這本來是外交上一個妙技，為國家打算應該如此的。可惜他沒有認清中國是一個弱國，經不起這樣和人家玩弄的。這是和內戰不同的。內戰的時候，祇有你的實力是最大，怕人家協以謀我，可以用如此分化的政策；所以是成功的。外交則不同，日俄兩個強鄰，那里可以任你如此玩弄？在去年武漢將失未失的時候，蔣先生和一位暗中奔走和平的朋友說，『日本應知道以大事小的道理，中國應知道以小事大的道理』。那末，我可以加一句，『小國無信，何以自保』？蔣先生的外交失敗，就失敗在『無信』兩個字上頭！

自九一八以至於盧溝橋事變，中日問題當然有種種解決的途徑，其所以不能解

決，以至於戰爭，在中國方面的責任，確在無信兩字。自蘆溝橋事變發生以後，甚而至於南京失陷以後，一般人僅知道政府或蔣先生個人祇有堅決的抗戰到底，那知道其中時時刻刻不斷的有和平運動；或者可以說，蔣先生的希望和平，並不減於抗戰。其所以不能成功，而造成今日的局面；其原因也在無信兩字。蘆溝橋事變發生以後，蔣先生在廬山談話會席上的談話（後來報紙上發表的談話，和當場口頭的談話大部分不同），並沒有堅決抗戰的表示。他有兩句話是很重要的。他說，『這次事變如果釀成戰爭，中國可以亡國的』。所以這次戰爭的危險，他是看得到的。在八一三的前夜，他還派了外交部的某君，到上海和川樾見面（川樾的表示很好）。但是他這件事，不但不給一般人知道，連外交部長都不知道的。後來外交部長知道了，忽然去問他，他就堅決的否認，並且立刻召某君回京。某君一到南京，見了他，他又說某君『你爲什麼這樣快就回來』。

自八一三以至於南京失陷，其間和日本人接觸的和平奔走，據我所知，的確是沒有。但是汪先生，國內一些名流學者，以及蔣先生一部分的幕僚（如張羣等），都是隨時向蔣先生建議『適可而止』。蔣先生的答覆，總是『時機未到』四個字。南京失陷時，德國大使的一幕，汪先生『舉一個例』這篇文章已經說得很詳細了，用不着再說。自此以後，日本政府就發表一一六的聲明。但是蔣先生和平的期

望，並未斷念。去年二月間，蔣先生就派某君到香港成立機關，專作與日本人聯絡用的。某君奔走於上海東京香港武漢之間，都是有詳細報告給蔣先生的。蔣先生還和某君說，『我是有反共的決心，但是必須待戰事結束之後，我才可以開始作撲滅共產黨的工作；這一點希望日本方面諒解的』。不久，蔣先生又命待從室某君電授機宜於香港某君，向日本徵詢關於第三國調停的意見。

在宇垣初任外相的時候，蔣先生又命張羣致賀電於宇垣。這賀電的大意如下：『兩年以前，我（張羣自稱）任外交部長的時候，閣下給我賀電，命我以東亞和平自任；我現在亦以此語奉賀閣下』。從此以後，張羣即命其心腹張季贊藉大公報在香港出版之名，常川駐港，與日本方面聯絡。當時他的建議，是很離奇；說要陳立夫到菲列濱先與日本某人見面，再由日本派大員到衡陽和蔣先生見面。談的都是手續，未曾深涉內容。所以結果一無所就。

和張羣雙管齊下的，就是孔家的和平運動。初步奔走的是有所謂喬秘書，後來孔夫人以及孔公子都和日本人見面了。更奇的，孔家的和平運動，是把什麼條件都答應了？可惜日本方面接洽的，不是政府負責的代表，所以結果也是一無所成。

總而言之，蔣先生的策略，是明裏抗戰，暗中偷和；明裏容共，暗中反共。換言之。就是拿共產黨打日本，又拿日本打共產黨。一直到武漢失陷的前夜，也還是

如此。一面發電報與莫斯科，要求締結軍事攻守同盟；同時又發電與羅斯福，請其調停中日戰事。結果，兩面都失敗。這種左右開弓的外交，如何可以取信於人。玩弄到現在，祇有進退維谷。所可憐的，國家與人民而已！

對於大亞洲主義的認識

若 耶

汪先生的論文『我對於中日關係的根本觀念及前進目標』，其重要之點是指出了和平的積極性。一般人對於和平的觀念，多是把它看作無可奈何，打不過則和，吃虧也沒有辦法，總比亡國滅種好些。這種看法，完全是消極的，是把和平當作一杯苦酒，既然自己斟上了，只好自己喝完它。在這一幅和平的圖畫裏的中華民族，是慘淡的，鬱怒的。並且從這裏產生出兩種心理，一種是完全被慘淡的景色所壓倒了，對於和平之後復興中國的命運感覺渺茫，黑暗，這一種心理如果普遍了，戰後的中國，就會發生五胡亂華時代那樣的頹廢與不負責任的風氣。另一種心理是，完全被鬱怒的情緒所壓倒了，以為戰後的中國要想復興，只有「找機會向日本報仇」。這一種心理如果普遍了，此後中日兩國便只有走上普法戰爭的結果那樣循環報復不已。

爲什麼會把戰後的中國看作這樣慘淡，這樣鬱怒呢？就是因爲他們沒有看到和平的積極的一面。這積極的一面就是戰後中日兩國本着共存共榮的精神，負起復興東亞的責任，在復興東亞之中走上復興中國這一條大路。這也就是汪先生所啓示我

們的。這一幅擺在我們面前的圖畫是光明燦爛的，沒有感傷，也沒有鬱怒的氣氛。

可是汪先生的主張最需要解釋的也就是在這一點上。現在很有人同情和平，但是對中日共存共榮之說起反感，不然也以爲這不過是解嘲。但汪先生說中日議和應當避免普法議和那樣的循環報復，是以中日議和必須平等爲前提的，即日本不能像普魯士對待法國那樣來對待中國。汪先生說的復興東亞，是以日本所倡導的東亞新秩序必須與，總理的大亞洲主義相符合爲前提的，即日本不能做照俄皇的大斯拉夫主義來製造東亞新秩序。必須日本所倡導的東亞新秩序與 總理的大亞洲主義相符合，中日共存共榮的意義纔不是中國的片面希望，而爲日本所同樣認識。必須中日皆有此認識，而後雙方纔有平等議和之誠意。汪先生的和平理論體系的核心在此，汪先生所必堅持的談判具體條件的依據亦在此。

中國人必須認識，外交的權謀術數只能醞釀危機，擴大矛盾。中國要想利用英國牽制日本，是一條走不通的路；因爲英國是在退却中，英國人自己說過，中日戰爭不過觸及了大英帝國邊緣，在退却中首先放棄的就是邊緣。中國要想利用美國牽制日本，也是一條走不通的路；因爲美國雖然是在進取中，但要是我們真能煽動美國和日本開戰，那時候中國會變成什麼呢？變成塞爾比亞。奧國進攻塞國，幸得協約國出來干涉，而且釀成大戰，這於塞國有什麼益處呢？在遠東，無論是英美俄

要是她們之中有一個和日本動武，結果就會是世界大戰，在這個世界大戰當中是列強能够驅遣中國呢還是中國驅遣列強？稍有頭腦的人都可以明白的。何況這個希望都不能實現，因為歷史上只有強國授意或壓迫弱國去打世界大戰的頭陣，弱國可不能請求或煽動強國去發動戰爭或者參加戰爭。眼前我們就是聽到中國是爲英國而戰，爲保衛蘇聯而戰，爲維持美國的九國公約而戰這一類說話，終不見有英國、蘇聯，或者美國爲中國的獨立自由而戰。這難道還不够使我們醒悟嗎？若說是僅僅希望英美以調停的方式來抑制日本的過份要求，那麼，過去八國聯軍之役就是一個好教訓。當時中國賄賂俄國並且賄賂日本幫中國說話，結果如何呢？賄賂只成了額外損失。現在呢，說來痛心，一邊是淪陷區，一邊是重慶政府。在淪陷區，因爲我們還沒有一個統一的主持和議的機關，與日本就地交涉，權益之損失已經很大。而在重慶政府，由於依賴更由於賭氣，草草斷送權益，已成江河之勢，據聞最近進行向列強借款，爲數不過一千萬鎊，由某某兩國各出五百萬鎊，中國則以出讓雲南全省鑛權爲代價。這種局面多延長一天，日後復興中國的基石便多耗損一塊。我們將來還要做人，我們的子孫將來也還要做人的，我們不能眼看五千年來國家民族的遺產一下子就被化費得精光；要講和，就要講得快。

與日本議和，我們必須認識日本的地位。只有日本與中國共存共榮，遠東的和

平穩能長久保持。稍有頭腦的人都不願意這次對日戰後再被捲入世界大戰，而且担
心議和條件中的中日軍事外交政策一致。將來會弄到中國被日本驅使去攻打蘇聯或
英美。其實中日要是能够像英法那樣合作，遠東在整個國際上的影響就會和現在的
大不相同。現在是歐洲成爲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龍脈。是歐洲決定遠東，歐洲打起來
，中國和日本個別的都沒有辦法保持中立。中國是弱國，但是日本的政治家也在願
望避免捲入第二次大戰，願望是一件事，但能否中立，則被客觀的國際間勢力關係
所決定。只有中日合作。但能增加亞洲的重量，這個重量，即使不够制止世界大戰
，但有可能做到中立。這於人類便是一個偉大的功績。

其在日本的政治家及其人民，則必須認識中國的地位。現在沒有那一個國家可
以滅亡中國，這一層日本經過兩年來的戰爭，也已經從經驗上明白了。而且也沒有
那一個國家可以劫持中國。誰劫持中國，大亂子就會爆發。英國利用中國施行法幣
政策的機會，想從金融上支配中國，結果英美起了衝突，而英日倫敦談判關於華北
投資合作問題的破裂，也就胎息於此。蘇聯想要支配中國，成了中日戰爭延長的主
要原因之一，中日戰爭一延長，中國固然倒臺，然而遠東方面反共同盟的形勢也就
一天比一天成熟起來。日本想要支配中國，她雖然不怕英國，然而對於美國方面來
的隱憂則正在加重，成爲日本外交家最難措手的問題。中國既然不是可以被滅亡的

，而且不是可以被支配的，然而中國是可與合作的，明白這一層道理的最早要算美國。美國領導的華盛頓會議及九國公約，她的方針便是扶植中國之自由獨立，只有自由獨立之中國，纔能不被英國或日本利用以爲阻難美國的工具，美國在中國的歷史基礎雖遠不及英日，但是靠了這個方針，居然進展了許多。要是日本也採取這樣的方針，幫助中國從列強支配之下解放出來，其成就一定會比美國的更大。在歐洲，能够幫忙英國的現在只有法國，能够幫助德國的只有意大利，在遠東，能够幫忙日本的只有中國。要是法國是西班牙那樣一個不爭氣的國家，或者簡直像印度那樣只是英國的一個殖民地，試問英國在對付德意這一層上將會感到若何困難？意大利要是只有像匈牙利或者希臘那樣的地位，德意軸心也就建立不起來了。至於中國，她一天陷在半殖民地的地位，她便一天依賴英美以與日本對抗。只有獨立自由繁榮強盛的中國，纔能成爲日本的有力的朋友。只有中日兩個有力量的國家相結合，遠東對歐美之比重纔會增加，有如美洲之於歐洲。

中日兩國人民及其政治家只有根據這種認識，中日和平的原則纔能確立，復興東亞，復興中國，以及挽救日本戰後的危機，纔能找到一條正確的途徑。

大亞洲主義的核心

雲 孫

東洋的本能

日本前首相近衛文麿氏於本年七月七日在東京日比谷公會堂演講，題目爲「東洋的本能」，其中一段謂：

「現世界之不安，甚因於新秩序產生之煩惱與苦痛。世界大戰後二十年間，全世界窒息於舊秩序之維持精神及第三國際之破壞工作間。吾人處於二十世紀之正中，站在舊秩序之分水嶺上，負擔創造新秩序之命運及本世之責任。事之艱鉅，亘古未有。此種現代的使命，須由簇新的認識始得理解。惟有澈底於此種使命之完成，始得變艱巨的負擔而爲光輝的希望。吾人基於此種認識，根據此種使命，確立以東亞諸民族之自動協力爲基調之外交方針，以喚起中國國民間所潛在之『東洋的本能』，同時與歐洲進步主義之諸盟邦，協力於世界新秩序之建設。」

近衛氏在這篇演講中，雖未曾具體說明何謂「東洋的本能」，不過據吾人的直覺，這「東洋的本能」，應當是大亞洲主義的核心。

四十五年來，中日兩國民大部都忘掉了，掩沒了這種種族上先天的本能。不過其間偶有某一短促的時期，透露出這種極可寶貴的本能。但是因爲執政者不能因勢善導，終於使露出萌芽的本能，仍舊掩沒了下去。仍舊被遺忘掉去。第一次，是在日俄戰爭的時候，那時中國人雖是甲午戰敗的創痛猶新，但是並沒有希望俄勝日敗的心思。每聽到日軍打勝，朝野上下都是私心慶幸。這並不是因爲日本打勝於中國有利，或是俄國打勝於中國不利的那種功利主義的關係，這完全出於漠然不可明言的本能的衝動。總理也說過那時候總理剛剛經過蘇彝士運河，遇見土人阿拉伯人，他們以有色人種的立場，聽見日勝俄敗的消息，也都高興的不得了。反而和日本有同盟關係的英國人，聽見俄國打了敗仗，却是大吃一驚，搖首皺眉，以爲日本打了勝仗，終非白人之福。這些都是基於這種種族上的本能的緣故。再一次，就是總理在革命初期，深得日本同志之助，在東京成立同盟會，奠定中國革命的基礎。那時候日本人之贊助革命者，並沒有藉端干涉中國內府或借題搗亂等不純正的心思。完全以一種兄弟相助的本能，希望中國獨立自強。宮崎寅藏氏於其所著「三十三年落花夢」一書中，有一段敘述他的二兄對他說：「若支那得光復，則印度可興，暹羅安南可振，菲律賓埃及可救也。至如法蘭西，美利堅，則民族帝國主義之梟傑，其國民雖高尚，吾不欲見之。夫汝欲恢復人權，奪回權利，使我黃人，爲有名譽之種

族，轟轟烈烈，建新紀元於宇宙間，捨此以外，無可來也。『宮崎氏得此勉勵，遂來中國，物色英雄，參加總理所領導的中國革命。這一種行爲的動機，毫沒有利害的打算，完全出自民族的本能。』

不幸得很，此種本能，在中日兩國間，表現出的時期短而暫，掩藏着的時期長而久。因此這兩個理應相親相愛，共存共榮的東洋民族，不但弄到爾虞我詐，相傾相軋地步，近且頭破血流，相互火併，行將陷於相與偕亡、同歸於盡的絕境。不過在此縣崖絕壁，山窮水盡的當口，透出來了一道曙光；在日本就是近衛氏去冬在首相任內所發表的設立『東亞新秩序』的聲明；在中國即是汪先生所領導的和平反共救國的偉大運動。這一篇聲明，這一個運動，喚起了幾十年來潛藏在中日兩大民族心底的『東洋的本能』，使日本的大陸政策重新獲得了新的評價，中國的三民主義重復依據了總理的大亞洲主義的遺教，有了新的發展。

所以日本方面所倡導的東亞新秩序，必須適合於總理的大亞洲主義，始有其成立的根據；而總理的大亞洲主義，必須先喚起潛伏於中日兩民族的內在的『東洋的本能』，然後纔有發揚光大的動力。長時期被遺忘掉的，掩蔽着的這種本能一旦果能透露萬長出來，則中日間一切不可解決的難題，都有迎刃而解的可能。根據這樣本能，和平恢復之後，兩國間再沒有歷史上那樣循環報復的悲劇；也沒有一般戰

爭結束後國民間常有的那種悲憤鬱怒的情緒。不過在目前這種本能僅僅露出了萌芽的嫩尖，還需要大家努力的壅培，使牠能够迅速地長成而蕃殖。同時，頂要緊的，是雙方都要努力改造環境，剷除一切阻礙和平的反動勢力，免得牠的長成蕃殖，受到摧殘和遲延。

中日合作的基點

若耶

兩年以來，中國爲求確立對日關係，曾訴之於武力，訴之於國際的合縱連橫，結果是失敗了。兩年以來，日本爲求確立對華關係，曾訴之於武力，訴之於國際的合縱連橫，結果也是失敗了。訴之於武力的結果，在中國爲喪師失地，在日本爲勞師無功。訴之於合縱連橫的結果，在中國爲隨人俯仰，在日本則使問題更加複雜化，纏結東戰事愈遠。可是到了現在，武力不能解決問題已爲中日兩國政治家所認識，而合縱連橫則中日兩國政治家猶有繼續利用之者。他們並且企圖以無結果的合縱連橫來補救武力的無結果。現在歐戰發生，重慶政府又在幻想新的救星到來，而日本方面或許也有人以爲這個新的國際形勢可以產生一種新的對策，來代替以近衛聲明爲原則的對策，或以之修改近衛聲明。這種心理，雙方都是應當糾正的。

何以中日兩國政治家還在那裏繼續訴之於武力，繼續訴之於合縱連橫呢？有一件事蒙蔽了他們，使得他們雖然看到了武力與合縱連橫之爲無結果，但仍然不肯斷念。這一件事就是他們還沒有透徹明白所要確立的是何等樣子的中日關係。汪先生與近衛公爵都會指出中日關係應當是兩國的平等合作。可是在中國還有人以爲要是

不能打倒日本，便只有做到兩國對抗地位之均勢，有如平時德法關係之雖相仇而不相浸。其在日本，則還有人以為要是不能征服中國，也應做到日華主從關係之確立，有如英帝國之於自治領。因為他們對兩國的平等合作關係認識不夠，所以他們對於建立這種平等合作關係的手段，兩國以誠意作直接妥協這一點，就常常動搖。

現在我們就以極明朗的語句再來闡明中日平等合作的準確內容——

第一，中日平等合作在中國為完成其民族主義，在日本為發揚其明治維新以來之國運。復興中國與強化日本之並行不悖，其終結為亞洲的解放與繁榮。這個解放亞洲與繁榮亞洲的事業，在日本有『東亞新秩序』與『東亞協同體』這一類名詞，在中國則有孫先生的大亞洲主義。日本人於其『東亞新秩序』與『東亞協同體』有各種解說，但孫先生的大亞洲主義却是明確極了。那就是：分担這個解放亞洲與繁榮亞洲的事業的主體；中日兩國，其相互關係應當是朋友，而不是主僕。雖然是朋友而不是主僕，但可以有領導，不過這個領導應如英國之於法國，不當如英國之於自治領。要是如同英國之於自治領，便不是領導，而是支配了。也只有結成朋友，中國纔能分担復興東亞的責任，僕人是沒有分担的魄力的，正如英國有了法國做朋友，在處理歐洲問題上纔能起決定的作用，要是英國只是多了一個自治領，這個作用就談不到了。

第二，中日軍事外交一致，對外應當是用以保障東亞的和平，不應當拿它來參加歐戰。中國現正渴望結束中日戰爭，如果結束中日戰爭是爲的參加更大的戰爭，此非人情所願。何況歐戰發生，對於中國是只能增進其以外交收回第三國在華特權之機會，却不能藉此以武力驅逐第三國勢力；對於日本，在只能增進其對華直接妥協之機會，與中國合作以復興東亞，却不能藉此拉了中國去和第三國作戰。其在中日之間，兩國軍事外交一致，日本不應當是拿它來建立一種軍事體制的對華管理。中日軍事外交一致應當怎樣呢？此刻還待具體的研究，但其性質可以是相當於美國領導的泛美洲國防聯盟。

第三，中日經濟合作，須以不妨礙中國利用第三國資本之自由，並且不妨礙中國經濟之發展爲原則。近衛聲明指出日本不擬獨佔在華權利，並且是要平等提攜，這是很對的。戰前兒玉率領的考察團來華，曾有『日本工業中國農業』之說，非中國所能接受，現在希望日本不再有人拿經濟合作來這樣子解釋。中國需要工業化，這是不能否決的。如果做不到工業化，就是原料也不能開發的。美國現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原料供給者，原因還是因爲美國同時是一個工業高度發展的國家。日本需要中國大量供給原料，就應當幫助中國高度發展工業。若問兩個工業化的國家是否可以合作？這個問題是無從發生的。坎拿大的工業高度發展，正因其如此，所以美國和

坎拿大的經濟關係纔比較和拉丁美洲農業國家的更爲密切，更爲和諧。英法兩國的工業都是很高度的，正因其如此，英法兩國的經濟合作纔比較和土耳其或波蘭的更爲密切，更爲得力。這幾個例子就很可能使我們明白了。

我們希望日本以其誠意爲理智，依據上述三點以爲中日平等合作的基礎，則和平運動可以迅速成功。

和平非權術能致

若耶

二八

十五日孔祥熙發表談話，謂須俟日軍撤退，中日始能妥協。這有兩點用意：其一，借全面解決來打消英國對日作局部妥協；其二，宣傳東方明興會議來打消我們所主張並為國人所願望的中日直接談判。

結果，第一點是失敗了。對於東方明興會議的期待，雖然不久以前蔣介石曾經當面吩咐過香港國民日報的言論負責人陶百川，而且就在前一兩個禮拜，孔祥熙的兒子在香港播放東方明興會議經已到來的樂觀空氣；然而事實上，這次英日東京談判並未具備結束中日戰爭的形勢。沒有美國參加，英國是要避免作全面的解決的，即日本以主張的全面解決，也不是說要把中日關係一總解決，即是要求英國對日讓步不僅限於天津。由英日單獨妥協或英美平行調停所作成的和局，要中國承受，手續上都須經過中日談判，在目前，日本既經決心不以蔣政府為談判對手，而新的談判對手也還沒有出現，國際調停就根本沒有一個寄托點。這樣，蔣氏之徒對東方明興會議的願望便落了空。那麼，僅僅拿它當作一個口號來延宕英國在天津事件上對日作局部妥協，使之成爲無結果，以苟延法幣在華北的殘喘，這是否可能呢？這也不能

。英日談判的重心在日本不在英國，重慶政府只知道拖住英國的衣襟，講話又那能有分量？這兩天的事實證明，英國經已願意讓步，日本經已準備接受這種讓步。孔祥熙的談話呢，一點影響都沒有；而因英國的這種讓步所促成的法幣在華北根據之消失，引起法幣的全線震動，數日之間由六便士左右跌至四便士以下，這種事實則是說明了民族的危機，絕不是蔣介石之徒的小小術數所能挽救的。

第二點也失敗了。民衆不是那麼容易欺騙的，更不是可以無數次欺騙的。以前說英日開戰，日蘇開戰，期以三月，期以六月，三月六月之後終於被民衆拆穿了。這次呢，孔家人宣傳東方明興會議，說過兩禮拜就可以結束中日戰爭，拆穿得就更早。蔣氏之徒爲要對抗我們所主張的中日直接交涉，爲要收攬已經失去的人心，近來就有天天在那裏播放和平空氣。首先是香港大公報道：「和議今非其時，汪非其人」。隨後是吳鐵城辦的香港國民日報說道：「張之洞不配議和，李鴻章才配議和」。今日的李鴻章是誰呢？指的是蔣介石。爲什麼和議今非其時呢？爲的是中國還有力量的繼續抗戰嗎？爲的是日本還在想非滅亡中國不肯放手嗎？都不是。爲的是，國際調停還沒有來。雖然如此，他們終究也急起來了，最近就在避免談到時機的問題，專談「其人」的問題了。這批人向來是在槍桿子面前發抖慣的，他們以爲，在日本，近衛是文人，他的聲明不算數。要軍部說過才算數，因爲軍部有槍桿子。在

中國，汪先生是文人，他的鑿電也不算數，要蔣介石說過才算數，因為蔣介石有槍桿子。中日講和，必須那一邊是軍部，這一邊也是軍部，槍桿子對槍桿子，兩國人民這才拍手歡呼。這種劣根性我們也懶得去說他們。但我們的意思，要是蔣能夠和得下來呢，當然是最好。抗戰以來，汪先生爲什麼還和蔣共事得這麼久，爲什麼電發表後還期待了蔣這麼久，就是因爲我們想由蔣來和，問題要簡單得許多。這上頭，我們根本沒有作個人地位的打算。但是事實的教訓，終於使我們對蔣斷了念。蔣的毛病，就在於依賴英國，蔣所指揮的政府這幾年一天比一天更深的跌入殖民地外交，汪先生的論文所舉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有田與蔣會見，蔣經已答應三原則，其後忽然全盤翻悔，就是因爲法幣政策施行後中英結成了新的關係，此後蔣對外交就不敢自作主張。這樣，中日之間就無可再談，終於把問題交給英日倫敦會議去解決。倫敦會議僵化，日本發動七七事變以爲刺激。英國一面徵求美國合作，一面叫蔣等待。當時宋哲元請示方針，蔣給了他一個不得要領，結果是聽憑七七事變自然擴大。一星期之後，美國國務卿表示反對艾登的通知書不加工理會，再過兩星期，英國宣告倫敦談判破裂，再過兩星期，就來了八一三事變。這樣，中日就打起來了，爲什麼當時中國不自己想想辦法呢？蔣所指揮的政府，就這樣子不敢自己做主的。

又如去年年底近衛聲明發表，倫敦太晤士報就來一篇評論，承認近衛聲明是對中國而發，而且條件寬大，但是希望中國不至於接受云云。爲什麼不希望中國接受呢？因爲中國的事應當由英國來作主！接着美國和英國先後致牒日本，提議召開國際調停，藉以打消中日直接交涉。這樣，蔣就拒絕了近衛聲明，期待着國際調停。五中全會宣言鄭重其事的，響應英美的提議，其後又有宋美齡王寵惠的談話，都表示中國願在國際調停之下結束戰爭。這樣期待了兩個多月，英美毫無動靜，纔知道上了當。到了三月間，蔣派蕭振瀛去香港與日本代表談判，一時中日直接交涉暗行甚急，在香港與日本代表接洽者尚有吳鐵城等。張羣的代表則派至上海活動。這一來，英國很怕中日直接談判成功，駐華大使寇爾與駐日大使克萊琪在上海會見，交換情報，並商定制止中日直接談判之對策。克萊琪返日表示對日妥協，以英日妥協來打消中日妥協；寇爾則去重慶，許以國際調停就將來到，以國際調停來打消直接談判。這一來，蔣就停止中日談判，又來等待國際調停了。當時英日妥協空氣極濃，日軍在鼓浪嶼登陸，英國曾經承認其爲合法。但美國忽然表示強硬，英國未便獨異，於是英日關係又惡化，一直發展到天津事件。重慶政府呢，這時候弄得一點主意都沒有。最近孔祥熙的談話又提到中日妥協云云，實在是因爲等不下去了，但是等不下去也得要等，孔祥熙一面說中日可以妥協，一面爲什麼又說必須日軍首先撤

退呢？歷史的先例從來沒有過先撤兵後講和，只有先停戰後講和。要日本先撤兵，中日妥協就只好延宕下去，而這種延宕却正是蔣所需要藉以等待國際調停的來到的，並且可以對民衆推諉中日妥協延宕的責任不在蔣之株待國際調停，而在日本之不肯撤兵。

中國的事情應當由中國自己作主來解決。我們並不主張與英國結仇，相反的，我們十分主張中國對英國尤其是對美國增進友善關係，但我們反對蔣介石那樣子依賴英國，自處於殖民地的地位來辦外交我們主張中日親善，但我們同樣反對依賴日本。自處於殖民地地位來辦外交的蔣政府，決不能替爭取獨立自由的中華民族覓取和平，這是三年多以來的苦痛經驗所給予我們的認識。

蔣不但因為依賴英國之故不能替我們覓取和平，而且因為對內獨裁之故不能替我們覓取和平。例如前年陶德曼第一次調停，蔣已接受，並且草就了致希特勒請其正式出面調停的電文，剛要拍發，張羣進言，謂淞滬之役中央軍損失五十萬，地方軍尚能保持原有實力，此時而和，中央即將無法建立軍事獨裁，這一席話就使蔣謝絕了陶德曼。其後陶德曼第二次再來調停，蔣又表示接受，但因那幾天正在審判韓復榘，要等槍斃韓復榘之後纔來正式進行和議，這樣可以做得好看一點。不料這一等待，接着就來了一月十六日本御前會議的聲明，不以蔣政府爲對手了。

和戰是何等大事，蔣却一面依賴英國，一面對內玩弄手腕。事實已經十分明白，除非等到國際調停到來，除非等到地方軍隊全部消滅只剩下蔣家軍和紅軍，蔣是不會給予民衆以和平的。但是國際調停給予我們的將是阿比西尼亞，捷克與西班牙的命運，而地方軍隊還沒有全部被消滅以前，中國內部已經會大亂了。

蔣的統治體系已經是凝固的，它不能走向改善，只能走向毀滅。但是中華民族不能做蔣政權的殉葬人。中華民族要求的政權是對外能够自主，對內能够民主的政權，只有這樣的政權纔能給予我們以迅速的和局，平等的和局。

撤兵問題

若 耶

中國共產黨人有一句漂亮話：把日本軍隊一直趕出滿洲境外，然後講和。香港大公報也說過：驅逐日軍出境，然後作無條件的和平。最近孔祥熙則說：須俟日本撤兵，中日纔能妥協。須俟日本撤兵，就是說打退日本兵是不可能了，因而這個和平也不能是無條件的了。

但孔祥熙的話是否對呢？也不對。先撤兵，後談判，這種例子在過去歷史上只有過一回，那就是歐戰終了時協約國對付德國的辦法。當時協約國對德國所提休戰條款，實際就是撤兵條款，它要求西線德軍從比利士，法蘭西，亞爾薩斯羅倫立即全部撤退，東線德軍從所有屬於俄國，羅馬尼亞或土耳其的領土立即全部撤退，並須交出俘虜，槍炮，飛機，戰艦，然後開始議和，並且議和也不准德國的代表參加。但這種先撤兵後談判且不以交戰國為談判對手的和局，究竟是特殊的。一般的和議形勢，總是戰敗國不能要求對方先撤兵後談判，因為對方是戰勝國；戰勝國也不會要求對方先撤兵後談判，因為對方是戰敗國，無兵可撤。只有歐戰末期的德國，已經是戰敗國，但她的軍隊却佔領着戰勝國的領土，所以弄得戰勝國要求戰敗國撤

兵了。

這次中日戰局是否可與歐戰末期協約國與德國的戰局相比呢？不能比。中國並沒有像協約國那樣處在優勝的地位，日本也沒有戰敗。那麼，我們就只能按照一般的外交手續來進行和議。一般的和議手續總是先停戰，然後正式談判，而撤兵條件則列為正式談判的一部份，而且總是等到和約成立之後，撤兵纔履行的。這個，歷史上可供參考的例子不勝枚舉。拿破崙戰爭的結束是如此，普法戰局的結束也是如此。鴉片戰爭，甲午戰爭，八國聯軍的結束莫不如此。

拿破崙戰爭所引致的法國與同盟國簽訂的和約，就有這麼一條：「在三國賠款未清償以前，同盟各國派兵十五萬人佔據法國東北方面的要塞，由法國供給費用」。普法和約，關於撤兵的規定則是：「從波爾都國民會議批准條約之日起，德意志軍隊即開始撤出法境；不過撤兵是分期履行；並且須視法國賠款能否按期交付。在德意志撤兵期間，所有法國軍隊除了駐守巴黎的四萬人以外，都須退到羅瓦爾的後面。」明明白白，撤兵是在談判中決定，並且在和約成立後履行的。在滿清，南京條約關於撤兵的規定是：「英軍暫駐於定海及鼓浪嶼，俟中國賠款交清，五口開放後，始撤歸國。」馬關條約於撤兵的規定是：「條約批准後三個月內，日本撤兵。」辛丑和約關於撤兵的規定是：「聯軍之在北京者除防守使館兵隊而外，於本年九月

十七日撤退，直隸之外兵亦於二十二日開始回國，但賠償軍費則以七月一日爲截止之期。』一樣的明明白白，撤兵是在談判中決定，在和議成立後履行的。

由此可知孔祥熙所說先撤兵後談判是不合外交手續的。其用意只如我在前天的社評『和議與權術』中所說，拿這句話來延宕和議以待國際調停之到來，一面則欺騙民衆，推諉和議延宕的責任不在重慶政府之無能，而在日本之不撤兵。這種小聰明，只有貽誤國家大事。

在我們，關於撤兵問題已有汪先生的豔電明白表示：日本軍隊之撤退必須普遍而迅速，駐兵地點至多以內蒙附近爲限，而且以防共協定期內爲限。汪先生的告華僑書並且指出撤兵問題只能在談判中解決，作爲和約的一部份。這纔是嚴正的，腳踏實地的，拿來合先撤兵後談判的空談一比較，就可以知道重慶政府的說法是不負責任，是兒戲。

當前的急務復興中國國民黨

志遠

和平是有遠大目的的，轉變數十年來中日兩大民族相侮相仇之心理，成爲共存共榮長治久安的局面。中國於和平之後，可以走上建設現代國家的坦途，日本於和平之後，可以協同中國維持東亞和平。和平不是最終的目的，在我們說，和平是達到建設新中國，實現大亞細亞主義的手段。由和平到建國，工作繁重，經緯萬端，須有堅強勇毅的工作者或幹部，始能擔負，實現這種艱巨的任務。在現代的中國，這個工作者或幹部，無疑的就是奉行三民主義的中國國民黨。

但是現在的中國國民黨，在獨裁者的強力控制下，在腐化惡化份子的侵蝕劫持中，已不能負擔上述的偉大任務。所以我們想實現和平，必須先復興中國國民黨；想建設新中國，更須先復興中國國民黨。復興國民黨的工平做不到，和平固屬無望，建國更是空想。

有些人看到國民黨某些不可避免的錯過，國民黨內某些份子的罪惡，就發爲『毀黨』，『滅黨』的呼號，這是未認識現代中國社會的性質，更忽視了中國國民黨在現社會中所負的歷史使命。不說現代的中國便罷，提起現代的中國，就脫離不了

中國國民黨。國民黨是中華民國的產婆與保姆，中國的近代史就是國民黨的活動紀錄。國民黨既往的光榮史跡，如推翻專制，建立民國，護法討袁，北伐統一等，不必細講，近十年來中國在國民黨的統治下，已漸備現代國家的雛型，而一般建設的突飛猛進，更築成繼往開來的基礎，要不是獨裁者受制於惡化份子，輕啓中日釁端，中國或可日臻於富強之域，成爲安定東亞，保障世界和平的一支主力。更重要者是三民主義的信仰深入人心，牢不可拔，形成凝固的立國精神。這是國家起死回生的良藥，不是任何人爲之力可以倖致，亦不是任何人爲之力可以摧毀的。清末以來中國的擾攘紊亂，受人侵凌，肇因於固有的立國精神已經渙散，新的立國精神尙未確立。北伐以來，中國最大的成就，是三民主義由於萬衆的信仰與擁護，形成爲舉國信奉的立國精神。自由主義者對於三民主義，信奉遵守，已是衆所週知之事，卽窮兇極惡的共產黨亦以宣稱信奉三民主義爲其存在的護符。這種精神是國民黨幾十年來的壯烈犧牲，勇往邁進養成的，亦是國民黨的主義，適合國家需要，應乎民衆要求促成的，凡是愛護中國者，均應當發揚之，光大之，使成爲建國的動力，有些人不此之圖，反而高調『滅黨』，『毀黨』，『剷除三民主義』，不僅不會有絲毫成就，反是徒滋紛擾，阻碍國家的進步，未免大違反現實了。事實上以滿清的壓迫，北洋軍閥的摧殘，共產黨的惡毒，帝國主義者的砲火，都不能阻止國民黨的發榮

滋長。時至今日，國民黨在民衆間的基礎已經穩定，三民主義已成爲萬衆奉行的立國精神，更不是少數人所能毀滅，所能撼動的。

「毀黨」「滅黨」固不是辦法，任國民黨在強力的統治下，受腐惡份子的侵蝕以終，也不是辦法。要是如此，我們不僅無以對總理，對民衆，更無由勵行「和平」「建國」的大業，挽回中日兩大民族的劫運。因此，當前的急務是復興中國國民黨，復興有光榮歷史的革命的中國國民黨，然後才可以進而圖謀和平，建設國家，以實現國民黨所負的歷史使命。

現在幸而有國民黨的真正領袖，力排衆難，主持和平建國的工作，凡是國民黨的忠實黨員，凡是愛護國家的民衆，都應當懇請，都應當追隨 汪先生及其忠實幹部，先做當前的急務——復興中國國民黨。

國民黨的決心與行動

若 耶

四〇

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全國民衆之前指出和平已到了行動的階級，並且在全國民衆之前擔當起領導這個行動的責任。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並且在全國民衆之前表示其純化黨的立場，強化黨的紀律，發展黨與民衆的關係的決心。

大會考查抗戰以來雙方的處境及外圍國際形勢的變化，發現中國戰爭現在已經到了結束的時機。日本不能滅亡中國，中國亦不能戰勝日本，這個事實作成了和平的可能，並且決定了和平的性質，即和平的誠意是雙方的，和平的條件不是亡國的。過此而不結束，戰爭在雙方都成爲無結果，無結果的戰爭延長一天，中國便一天耗損其復興的基礎，日本便一天不能確定其國際地位；而且在歐洲形勢的激變當中，今天或明天，東亞的慢性戰爭隨時有可能遭受第二次世界戰爭的衝盪，而趨於總毀滅。

大會考查抗戰以來中日交涉的經過，發現交涉的爭點，已不在兩國的平等關係，而僅在蔣中正同志的個人地位。自德使調停失敗以至今日，蔣中正同志前後數次

派遣代表與日本秘密談判的結果，關於共同防共，經濟提携與善鄰友好三原則，雙方意見已無分歧，但日本堅持不以蔣爲議和對手，遂使談判擱淺。

大會認爲，中日戰爭既然到了結束的時機，即應結束戰爭；和平條件既然無損國家領土主權之完整獨立，即應實現和平。汪兆銘同志根據黨的立場根據中華民國的立場，在中日兩國人士之前及全世界人士之前嚴正解釋和平的三原則，確定其性質與範圍，以日本不自居於戰勝者的地位爲談判前提。對於汪兆銘同志的這個解釋，對方也已在中日兩國人士之前及全世界人士之前表示了他們的誠意。如此則談判和平的前提已經成立。大會並且認爲，黨要對國家負責；黨員要對黨負責。果能在無損國家領土主權之完整獨立之下獲得和平，國民黨沒有阻礙這個和平的權利；果能在無損國家領土主權之完整獨立之下並且在無損國民黨政權之下獲得和平，黨員個人更沒有阻礙這個和平的權利。現在國民黨的努力已表現其非爲和平的阻礙，而爲和平的負責者，它便斷然起來領導；而黨員個人蔣中正同志的私圖却已表現其爲和平的阻礙，他便應當走開。

蔣中正同志個人的私圖使他失去了國民黨的支持，民衆的支持，這樣他就依賴共產黨，被共產黨所利用，轉來劫持國民黨，劫持民衆。因爲和平會影響他的個人地位，他就阻礙和平到底。對此，大會鄭重申明黨的立場，否認一月十一日以後的中

央措施爲合法，否認一月一日以後的中央的實際存在，並且遵照黨的紀律，將投降共產黨劫掠中央的蔣中正同志解除其總裁職權。大會重申以反共爲其基本政策，並且根據北伐以來國內外情勢的變化，修訂了黨的政綱。

大會根據以黨建國不是一黨專政的原則，並且遵循戰前已在開始進行的立憲程序，議決黨外人士有參加中政會組織的權利，並且議決從速召集國民代表大會，實施憲政，以對內爭取民主爲對外爭取解放的主體。大會對於汪兆銘同志的以黨權扶植民權爲實現民主政治的手段，及其以和平收拾戰敗的局面，爲爭取民族解放的手段的主張，承認其爲準確，並且把黨的最高職權授予汪兆銘同志，責成其領導全黨，領導全國，以實現民主，實現和平。

本屆大會就是這樣子的在全體黨員在全國民衆之前表現了它的悲壯的嚴肅的決心與方針。我們想一想本屆大會的日期是在抗戰兩年國家民族瀕於淪亡的今天，本屆大會的召開是由黨員衝破藍衣黨及共產黨的箝制而自動提出的要求，本屆大會的地點是在淪陷的上海，真是感動極了，興奮極了。現在國家民族雖已瀕於淪亡，但有了國民黨，有了本屆大會召開後的國民黨，復興國家民族的信心與辦法也就有了寄托，有了頭緒，有了負責者。這個意義真是十分重大。藍衣黨與共產黨雖然可以箝制國民黨黨員個人，但終於不能箝制國民黨黨員全體，現在國民黨重以昔年衝出

袁世凱的紫禁城的勇氣，衝破了蔣介石的紫禁城，由最下層的發動召開了本屆大會，這個精神真是十分強毅。至於開會的地點，黨章本來規定要在首都南京，南京陷後，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只是遷地辦公，首都仍然是南京。不過在此期間，黨政的活動中心事實上是不在南京了。去年四月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就是在武漢召開。不在首都召開的。本屆大會召開的地點也不在首都，而在上海，這一層，應當是沒有疑問。但因此我們想起辛亥革命前夕，黨的活動中心不在漢族的淪陷區滿清帝國之內，即在國外，二十八年以後的今天，黨的活動中心還是要在淪陷區，這真是感慨極了，但正因其如此，所以國民黨的歷史是十分悲壯的。國民黨的領導者汪先生及其同志，抗戰以來所受的遭遇，恰好象徵了整個國民黨的命運，本屆大會本其為黨的最高權力機關的地位，否決了一月一日以來的重慶方面所加於汪先生及其同志的非法處分，這個，作成了真理的最後勝利。跟着這個勝利而來的，乃是和平運動成功的把握。我們可以十分恰當的說，在復興中國，復興東亞的意義上，本屆大會不但是中國政治史上最偉大的一幕；而且也是國際政治史上最重要的一幕！

共產黨的抗日陰謀

雪影

共產黨經六次圍剿後，不能立足江西，乃流竄至西北邊境，勢窮力蹙，無法自存，旋乃運用政治陰謀，揭發抗日政策。它諷知在社會安定，國家建設之下，共產黨不特不能發展，且有日逐消滅之勢，故竭其全力，宣傳抗日，利用外圍團體如人民陣線，學生救國會等，煽動輿論，迷惑青年，以期造成抗日潮流，挑起對外戰爭，乘社會秩序混亂之際，共產黨即圖混水捉魚，此種陰謀是顯而明見的。當時國民黨的決策，『治標莫急於剿共，治本莫先於建設，』而根絕赤禍的決議，猶見於三中全會。未幾，西安事變發生，共產黨用『擒賊擒王』的手段，掌握蔣氏之生命，順之則生，逆之則死，後經宋子文之稅駕，始以轉變國策之代價，易到蔣氏之自由，致使十年剿共之功，敗於一旦。國民黨的國策既因之而改變，共產黨的陰謀遂得以見售。其後七七事變，隨即發生。兩年以來，共產黨在抗日招牌掩護之下，次第實現其預定的陰謀，其陰謀為何？據中共的策略路線上說：

(一)抗日可以得到國人的同情，緩和敵人的攻擊，可爭取廣大羣衆，擴大紅軍，並可加緊黨的組織。

(二) 在革命情緒低落及力量縮小的現在，只有抗日才能保存和擴大實力。

(三) 只有抗日才能擴大帝國主義的衝突，才能有利於中國及世界革命。

(四) 只有抗日才能保護蘇聯。

關於前兩項，共產黨在抗戰兩年中，已有部份的實現，如紅軍數量的增多，共產黨組織的發展，都是顯著的事實。至於利用抗日救國的招牌，以博取國人的同情，則誠如汪先生所說：『民族意識，如今已被共產黨完全利用了。利用民族意識，在民族意識的掩護之下，來做摧殘民族斷送國家的工作。』它一方面利用民族意識以為煙幕，一方面却在做消滅國民黨推翻國民政府的工作，此種陰謀是十分毒辣的。關於後兩項，共產黨以抗日戰爭，當作第三國際世界革命的支隊。利用列強勢力的衝突，作為有利於蘇聯的條件。同時利用中日戰爭，使中日雙方的武力，為之對銷，而蘇俄在遠東之邊境，遂可高枕無憂，故其不惜犧牲中國，以保護蘇聯。所以汪先生說：『它只知道接受了第三國際的命令，要把中國來犧牲，犧牲的地方越大越好，犧牲的人數，越多越好，犧牲的時間越長越好，中國固然犧牲個精光，日本也不免要受多少創傷，這在第三國際看來，真個是一舉兩得，』這真是一語道破共產黨的內幕。然而共產黨的陰謀詭計，還不只此，在它的策略路線上又說：

『共產黨假民族統一戰線之下，在公開的半公開的環境中，迅速組織羣衆，武

裝羣衆，參加混入埋伏各方各項各種多樣的團體及組織中，積極地來活動影響他們，爭取他們，更要爭取廣大的勞苦羣衆，確實的而得到政權，等到民主共和國實現了，而無產階級專政的力量，也就養成了。也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開始了。社會主義的社會，也就產生了。所以策略要顧及到革命某階段的高潮或低潮，由此爭鬥過程中，見到革命到了高漲的時候，我們的策略馬上就要改變，而戰略亦要改變。所以現以反日在前，土地革命在後，階級鬥爭也放在後面。

「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黨，如放棄階級鬥爭，就不能稱爲共產黨。今天所說放在後面，並不是不同的，而是用另一個方式來運用，而運用的方法，就在抗日的口號掩護之下來進行的。」

「沒有土地革命，是共產黨不容許的。階級的鬥爭，就建在土地革命上，今天說將土地革命放在後面，並不是不實行土地革命，而且在抗日旗幟之下，爲的是聯合各階層，聯合統治階級，而打土豪分田地等，是不用蘇維埃政權的力量，是不用紅軍的力量，去打土豪分田地，而是用組織鼓動的方法，使人民自發的，自動的去打土豪分田地。所以在這個革命低落的時候，就事事都以抗日爲主，土地革命次之。抗日在明處，土地革命在暗處，進行了某一個高潮時，就將土地革命放在前面」。

我們讀了這一段共產黨的陰謀，親明顯的知道他們在抗日掩護之下，進行三種

目標：一是鑽入民衆團體中積極活動。影響他們，組織他們，造成共產黨的武裝羣衆，成爲無產階級的力量，以爲奪取政權的基礎。抗戰以前國民黨是不容許共產黨這樣做的，抗戰以後國民黨的主張已爲共產黨所挾持，一切陰謀計劃，都可自由施行了。現在不特陝北邊區實行無產階級專政，而淪陷區域爲游擊隊所控制者，亦多統治於共產黨手中，這種危機是不容諱言的。二是共產黨在抗日口號掩護之下，進行階級鬥爭。以前因爲共產黨爲一般人民所厭棄，而社會上又無階級分裂的事實，故階級鬥爭的法寶，無法運用，抗戰以後，所有失業失學的工人學生，以及流離失所，無家可歸的戰區同胞，都是共產黨認爲進行階級鬥爭的最好對象。它欲利用這些因戰爭而陷入悲慘境遇的人們，走上階級鬥爭的途徑。而且在抗日掩護下進行這種工作，沒有人敢說它是不合法的。三是藉着抗日的掩護，實行土地革命。它以前用暴力去沒收土地，弄到赤地千里，廬舍邱墟，生產減縮，餓殍載道，它現感覺用蘇維埃政權及紅軍力量去打土豪分田地的辦法走不通了，因而改用組織鼓動的方法，使人民自動的去打土豪分田地，這就是淪陷區中原有的政權已經崩潰，日本的軍力達不到的地方，遂有所謂游擊隊操作下的「抗日政權」，在那裏它們實行軍事共產。藉着「有錢出錢」的口號，將所有富有之家的財產，分個精光，過了一個時期，所有社會上的糧食財物，通通用完了，到那時如不甘爲餓殍的，只有自己動手耕

種，各佔一塊可以生產糧食的土地。這就是「使人民自發的，自動的去打土豪分田地」的辦法，也就是「抗日在明處，土地革命在暗處」的妙用。現在這種辦法不但在陝甘邊區施行，而且在冀察，魯豫，晉陝，蘇皖等邊區施行，在這種區域內的人民，就被共產黨生吞活剝的驅入黑暗地獄了。這便是共產黨的所謂土地革命。

以上的事實，是抗戰兩年中給共產黨創造出來的，這種危機的蔓延，若不能及時遏止，則中國未亡於日本，而先亡於蘇俄。國民黨具有先見的同志，早已有見及此，故主張反共，堅持最力。共產黨亦自知其偷天換日之計，瞞不過有識之士，故預先以種種污蔑的名詞加諸反共同志的身上，誣蔑之不足，更排而去之。最初，一般同志徬徨苦悶，計無所出，自從汪先生登高一呼，而我們同志不約而集於反共救國旗幟之下，一部分國民同志，雖在重慶環境壓迫之下，無法來歸，而心中無日不盼望反共局勢，急速發展，以拯救垂危的黨國。現在共產黨的陰謀已經暴露無遺，反共的潮流正在壯闊的開展，全黨的同志與全國的民衆都擁護反共主張，而日本對華用兵的目的，亦在於防共，中日兩國的目的既同，則和平釋兵，自屬應有之義。我們爲實現反共的主張，故必須和平，我們爲掃除和平的障礙，故必須反共，和平與反共實爲今日挽救國家，復興民族的惟一途徑。汪先生告訴我們：「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只有兩條路：一條是跟着蔣高調繼續抗戰，以整個國家民族跟着蔣爲共產

黨的犧牲，另一條路是把總理孫先生的遺志重新闡明起來，實行起來，對於日本，努力反敵爲友，第一步恢復中日和平，第二步確立東亞和平。我們既認定和平反共爲惟一救國的途徑，自當依照汪先生所指示的光明大路，勇猛前進！

「擁蔣抗日」和「抗日倒蔣」

江聲

五〇

……中國共產黨的惡毒技倆……

在西安事變前後，共產黨人提出了一句口號，叫做「擁蔣抗日」。這就是說：只要蔣介石能够起來抵日本，共產黨人亦就擁護他了。不過這「擁蔣抗日」四個字，要折開來看；就是擁蔣須以抗日為條件，抗日須以擁蔣為手段。然而這句口號總不失為一句迷人漂亮的口號。一方面似乎表示搗亂十年的共產黨，真有悔過自新的覺悟，一方面又表示蔣介石的威權，不但馭制了全國，而且竟能感化敵對十年的頑敵，使他們來擁護自己。

赤色記者斯諾在「西行漫記」中記載這件事說：當蔣被囚西安之時，東北軍中的急進軍官，和不滿足的士兵，以及有組織的武裝羣衆，都竭力主張加害於蔣，希奇得很，反而是共產黨勸告他們，應該保全他的生命，好多人以為共產黨為報復十年來蔣對他們殘酷的戰爭，現在要置之於死地。許多人相信，共產黨要乘此機會努力擴充他們的根據地，向南京挑釁，發動新的大鬥爭，以奪取政權。實際他們並沒有這樣做。他們非但促成和平解決，釋放蔣介石，並且請他回南京任領袖之職。甚至

宋美齡也說：「完全與外間所信相反，共黨並無劫持蔣委員長之意」。

這真是近代史上的一種奇蹟，這只有耶和華在天之靈明鑒其中的玄奧。歷史上雖不乏化敵爲友，破鏡重圓的先例，但那樣殘酷，那樣兇狠的共產黨，對於他們十年死敵的蔣，竟能有如此的急速轉變，難以令人置信。然而稍加推索，事情是很顯明的。我國古時有所謂「挾天子以令諸侯」的策略，近人尤善用「借刀殺人」的毒計。共產黨明知那時候若果加害於蔣，則南京方面將會和日本妥協，傾全力來完成剿共未竟之功。雖則痛快地出了一口毒氣，但是於自己無多大益處。因爲共產黨自從竊竄西北以來，深覺此後日暮途窮，無法再和國民黨抗爭，所以早就接受「第三國際的秘密命令，將階級鬥爭的招牌收起，將抗日的招牌掛起，利用中國幾年來的民族意識，挑動中日戰爭」。欲達此目的，非利用蔣的聲望和地位不可，非挾蔣以號令全國不可。在西安當時的蔣，雖則是階下之囚，生死由人，但在共產黨心目中看來，却變爲一件可居的「奇貨」了。而且他們又明白知道，要倒蔣非借重外力不可，這外力最容易最便當借得到的，當然是日本了。所以在這一次戰爭當中，可以利用日本的優勢武力擊毀蔣的軍事勢力，消滅蔣在東南沿海一帶富饒的地盤；同時更可以利用殘酷的戰爭，摧毀一切人民的生計，使之挺而走險，從事流寇式的游擊戰，以擴充紅軍的勢力。在蔣的勢力尙可利用之時，「抓着了蔣來做幌子」，等到

蔣的力量摧毀得差不多的時候，或是自己的勢力擴張到差不多的時候，就老實不氣地「回到他的第三國際老家去」了。

所以共產黨在表面儘管高叫「擁蔣抗日」，在暗中却是實行「抗日倒蔣」所謂「擁蔣」，拆穿了說就是「挾天子以令諸侯」。所謂「抗日」不過是「借刀殺人」而已。這一次的戰爭，日本人可以說是單料上當，中國人却是雙料上當。何以說是「單料上當」，因為日本人是未看清楚共產黨的毒計，費了這麼大的力量來發動這次戰爭。何以說是「雙料上當」，因為中國人不但是犧牲了自己的血肉，白白地替共產黨來消耗日本的國力，而且還莫名其妙地做了被共產黨利用的傀儡的工具。汪先生說：「正如兄弟兩個廝打一場之後，抱頭大哭，重歸於好，這是何等又悲痛而又歡喜的事？」中日兩國，難兄難弟，都是上了別人的大當，如今既然一朝澈悟，難道還不應該「重歸於好」嗎？難道還不應該從速結束這場惡鬥，「謀將來共同生存共同發達的大道」嗎？

陣線論者之悲哀

若耶

一九三五年第七次共產國際代表大會杜撰了陣線論的公式，在意阿戰爭上應用過，在西班牙戰爭，德奧德捷事變上應用過，都上了當；現在應用到中日戰爭上頭來了，也一樣的上當。這公式就是：

第一公式：日本（十）德國（十）義國——侵略陣線

第二公式：英國（十）法國（十）蘇聯（十）美國——反侵略陣線

中國當然算入第二公式，不但如此，而且中國正在犧牲自己人民的血肉，替反侵略陣線打頭陣，替英法美諸國在遠東維護他們的利益。所以屢次宣傳說：中國是反侵略的先鋒，中國是爲保衛大不列顛的利益而戰。在抗戰初期，有一種極普遍而可靠的傳說：只要中國抗戰三個月，蘇聯就出兵；只要中國抗戰六個月，英法美對日一定實施制裁。如此，豈不是第二公式的反侵略陣線成功了嗎？反侵略陣線既成，則侵略陣線諸國必定聯合起來，共同行動。於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和中日戰爭接連發生。這一場全世界惡鬥的結果，當然是反侵略陣線大獲全勝。中國抗戰既爲反侵略的先鋒，不用說，最後勝利是如操左券的了。這是陣線論者依照其公式所演算出

來的最後勝利的邏輯。這個結論被列爲國策，全國輿論一齊動員宣傳。於是此種似是而非，一知半解的公式理論，也竟成爲天經地義，牢不可破的鐵則了。

然而三個月過去了，六個月過去了，一年過去了，兩年過去了；公式自公式，事實自事實。其間每逢國際間發生一點事故，陣線論者必隨之吠聲吠影，大放厥詞。如去秋日蘇間的張鼓峯事件，德捷間的蘇台德區的爭執，在陣線論者眼中。前者爲蘇聯出兵之先聲，後者爲世界大戰之序幕。不料張鼓峯頭，史達林忽而掩旗息鼓；明興會上，張伯倫終於委曲求全。至今春德義兩國米蘭締約之時，陣線論者又竭力宣傳日本之必將加入，以符合其第一公式。然而事實上日本之外交決不如陣線論者所想像之簡單而笨拙。迨至英法蘇三國同盟談判一起，陣線論者更覺頭頭是道，眉飛目舞，以爲此乃第二公式之實現，反侵略集團之形成。在國內論壇上，雲中穿月，霧裏看花，大有好景初成，望梅止渴之象。然而迄今三月有餘，雙方討價還價，難關重重，談判仍止於談判而已。

以上云云，係就正面事實證明陣線論公式之不確。再就側面觀之，更可知兩種陣線間並無顯然的界限，殊無成立之理，例如侵略陣線之德國，對於反侵略先鋒之我國仍繼續大量供給軍火。反侵略陣線之美國對於侵略陣線之日本之軍火供給，佔日本軍火總輸入額之百分之五十。侵略陣線之義國與反侵略之英國間猶有英義協定

之存在，爲將來地中海上平分秋色之基地。至於德義與英法間則去年既有明與會議之默契，近來倫敦方面復屢次言明英國並無組成反侵略陣線包圍德國之用意，且表示願與希忒勒繼續談判，近復有巨款貸德之醞釀。在美國則視爲便利反侵略國家之新中立法，終於擱淺，亦無捲入反侵略集團之決心。再如侵略與反侵略之勁敵之德蘇兩國間，近復秋波暗送，竭力拉攏既有信用放款之消息，復開振興商業之談判。甚至世仇之法德間，去冬亦有和平宣言之簽布，謀善鄰關係之保持。他如日美，日法，德美間，雖不無衝突，但貿易關係並不受其影響。凡此種種，均足證明陣線論者所杜撰之兩種公式，並無實現之可能。最近英日間爲天津事件在東京會議中所成立之對中日戰爭一般原期之妥協，尤足爲陣線論者之當頭一棒，晴天霹靂。無怪乎重慶政府之終日焦慮，徬徨莫知所措。

總之，陣線論者之悲哀，在抹煞良心，另有圖謀，懷單面之相思，操如意之算盤，抱鏡花水月之幻想，存混水摸魚之鄙念，終至眼花撩亂，觀察不清，以致一着走差全局輸光。汪先生在艷電中明明指出國際間之助力僅能用於調停，俾我有利；不能用於解決戰事，使我獲勝。此蓋針對陣線論者之舛謬，意欲喚醒迷夢未清之人們。奈何半載蹉跎，大局益非。應早日舉行之中日和平談判，因重慶方面之深閉固拒，迄未見端倪，而出人意料之英日東京談判，反有逆來順受，水到渠成之勢。時

至今日，如再不當機立斷，另闢途徑，發動及時之中日談判，則他日恐繼日英妥協之後，或猶有日美，日法，日蘇等談判接踵而起，結果一定會弄到和由別人去議，字要我們來簽。重慶政府走的就是這條死路，凡是不願跟着走上死路的人們，應當即刻與之斷絕關係，另覓生路！

反對暗殺！

若耶

我們的同志沈次高先生被暗殺了！

暗殺的命令是蔣介石發的，由吳鐵城指揮藍衣社執行。我們鄭重揭發：暗殺的責任，是在獨裁者蔣介石，其走狗吳鐵城及其走狗的組織藍衣社。

暗殺的時間是八月二十二日下午八時半，是接連林柏先生被刺傷，曾仲鳴先生被刺死而來的第三次兇案。我們嚴肅指出：暗殺的性質，是獨裁者蔣介石，其走狗吳鐵城及其走狗的組織藍衣社的阻礙和平，與和平為敵。

暗殺的地點是在香港英文南華早報館附近，我們不能不對香港政府的維持治安表示遺憾，並希望其能從速採取有效的補救手段。

獨裁者蔣介石嫉使其恐怖組織，在戰前把以黨治國歪曲為一黨獨裁，不以黨紀責之於黨員而以黨紀責之於黨外的民衆。以及暗殺自由主義者的理由。在戰時，把民族抗戰歪曲為軍事獨裁，利用後方緊急治罪條例，把暗殺要求民主抗戰的青年，成爲合法化。到了現在，則利用中國共產黨所造作的暴民專制，把暗殺和平運動者，諉之於假托的民意。他阻礙了憲政的實現，阻礙了抗戰的革命行程，阻礙了和

平運動。我們堅決反對這種一貫的恐怖政策，我們必須打破這種獨裁的政治機構。

至於吳鐵城，過去他在上海執行暗殺的中心任務，現在則在香港執行暗殺的中心任務。他是出於愛國嗎？不，這只消舉出一個反證：十九年吳鐵城奉蔣命去瀋陽引張學良入關，爲的是利用他來搗亂擴大會議的局面，可是這樣子恰恰給了日本以發動九一八事變的機會，而東北也就這樣子給斷送了。他是出於擁護抗戰的誠意嗎？不，這也只消舉出一個反證：這半年多來他代表蔣介石在香港與日本代表秘密談判過好幾次。其中最顯著的一幕，就是三個月間蔣派前天津市長蕭振瀛去港與日本代表秘密談判，同時派藍衣社暗殺隊首領戴笠監視，而由吳鐵城總其成。他不是爲了愛國，也不是爲了真誠擁護抗戰，一句話，他是爲了做蔣介石私人的走狗而已。行刺林柏生先生的案件發生在香港，河內暗殺事件的佈置中心也是在香港，這次暗殺沈先生又發生在香港，而吳鐵城則從廣州失陷後就是香港方面暗殺工作的總負責人。我們只有掃除民族的敗類蔣介石及其奴才吳鐵城，並且徹底根絕藍衣社與中國共產黨，國事纔能走上軌道。

我們並且要忠告香港政府，我們所希望英國的友誼，是對中華民族的友誼，不是對蔣私人的友誼，我們誠摯的要求香港政府，不作便利蔣私人的企圖而違反中華民族的利益的行爲。據我們所知，前次行刺林柏生先生的兇手是捐餘俱樂部派出的

，該閒餘俱樂部是中共及藍衣社的中心活動機關之一，但迄今不見香港政府加以取締。河內暗殺兇手事前與香港方面的藍衣社取得聯絡，事後又相率匿居香港，但不見香港政府採取何種有效的制裁。香港暗殺組織所用武器，據聞藏在西南運輸公司，但不見香港政府加澈底的查究。這就是藍衣社之所以敢於在香港公然行暴，而且接二連三的行暴的緣故。我們除對香港政府已往維持治安之失察表示遺憾外，希望香港政府對今後治安速作亡羊補牢之計，對藍衣社及中共的暗殺行爲採取有效的制裁！

最後我們要在全國願望和平贊助和平的民衆之前指出：林柏先生之被刺傷，曾仲鳴先生及沈次高先生之被刺死，並不是說蔣介石他們有了辦法，而是正因爲蔣介石他們沒有了辦法。他們眼見和平運動已成爲全國人民的要求，故不敢訴之於民衆，訴之於國民黨，以民主力的方式來解決；而只好訴之於中國共產黨，訴之於藍衣社，以暗殺的卑鄙手段來解決。這正是他們的末路。而我們的主張則是，國民黨員與全國民衆，應當即刻自動尋求民主的方式來解決和戰問題。蔣介石他們要把關係國家大計的和戰問題交給藍衣社與中共去解決，我們卻要把關係國家大計的和戰問題交給國民黨與民衆去解決。我們追悼曾仲鳴先生與沈次高先生，紀念曾仲鳴先生與沈次高先生的殉國，我們就要幫助國民黨與共產黨決裂，幫助民衆從藍衣社的惡

怖下解放出來，把政權交還給國民黨，交還給民衆，而由國民黨與民衆去結束戰爭實現和平。

在淪陷區工作的意義

若 耶

我們應當認識淪陷區的地位，在解決中日戰爭及復興中國上頭是負有何等重要
的任務。要是現在的局面還可以戰得下去呢，淪陷區的民衆便應與中樞取得聯絡，
盡抗戰的最大責任，如果中樞不能領導抗戰，淪陷區的民衆也應與內地民衆結合改
造抗戰機構，或竟另行組織新的抗戰領導機構。像中國那樣的情形，戰爭的勝負之
數與其說是取決於後方山嶺地帶之爭奪戰，毋寧說是取決於爲全國人力物力所會萃
之沿海淪陷區民衆的努力方向及其強度。在去年近衛聲明發表以前，我們在南華日
報的會評，曾經這樣提倡量：應當以辛亥革命之精神在淪陷區工作；辛亥革命就是
在滿清統治了二百多年的淪陷區幹起來的；在滿清統治了二百多年的淪陷區內尚且
可以做光復的革命工作，爲什麼僅僅失陷了一年半載的淪陷區，還是熱辣的，就
不能負起這樣重大的責任呢？然而重慶政府一面在學宋朝末代的故事，每逢失陷了
一塊地方就當它是丟掉了，直退到南海的盡頭，投水完事。現在西南山嶺地帶等待
着重慶政府的命運，正和那時候在蠻荒嶺海等待着宋室的命運是一個樣子；另一面
則重慶政府又在學明朝末代的故事，留下一些流寇在淪陷區游來游去，雖然游來游

去，但明朝終於滅亡了。我們的那篇社評就指出政府對淪陷區要負責任；不可丟了就算，甚至假借焦土戰的名辭自動把淪陷區變成沙漠，明朝好在沒有採取這樣子的焦土戰，纔算給辛亥光復留下了人力物力的根基；我們同時指出淪陷區的民衆也要負起責任，不要聽憑游擊隊游來游去，以爲游來游去可以成就大事。這是我們在當時對淪陷區在抗戰中的地位的認識。

等到近衛聲明發表，我們指出中國雖已不能戰，但已可能和，半年多以來，我們從各方面考察和平的途徑，貢獻給國人，以爲共同努力之標的。但因重慶政府已陷於和戰兩皆不能之境地，我淪陷區民衆吃苦最甚，望和最切，應如何着力，乃爲當前最切要之問題。我們以爲，在淪陷區做和平工作，和在淪陷區做抗戰工作，在某一點上是共通的，即淪陷區在進行和議中的地位和在抗戰中的地位，仍然是同樣重要的。以前我們既然可以而且應當在淪陷區抗戰，現在爲什麼不可以或不應當在淪陷區進行議和呢？普法戰爭那一天，是法國代表到巴黎城外普魯士軍隊駐紮的地方亦即法國的淪陷區裏議和的。義和團之役，是李鴻章到八國聯軍佔領的北京亦即中國的淪陷區裏議和的。我們爲什麼不可以在此進行並完成和平救國的工作呢？或者有人會說，普法議和，法國的代表是法國政府派遣的，中國與八國聯軍議和，李鴻章是滿清政府派遣的，但是現在重慶政府並沒有派遣我們來淪陷區議和。但

這只是律師的觀點，不是一個政治家的觀點，更不是一個革命家的觀點。我們很容易舉出一個反駁：上次世界大戰，俄國民衆一致願和，前線軍隊自動在戰區與德國軍隊舉行聯歡，並且烏克蘭等地的民衆要求成立獨立政府與沙皇斷絕關係而與德國直接講和，他們都沒有經過沙皇的派遣，他們都在戰區或淪陷區發動並進行和平工作，他們是否犯罪呢？他們對沙皇政府犯了罪，但對俄羅斯是有功的。現在重慶政府既然在走向無底抗戰的絕路，國人只有毅然與之決絕，急起自救。無論後方，前方，淪陷區，所以民衆都應當爲和平而努力。以今日之情勢而言，內地雖爲重慶政府之所在地，但因經濟不發展，人民之政治的歷史基礎亦見缺乏，不比得沙皇那時候的彼得堡與莫斯科。在沙皇那時候是彼得堡與莫斯科來領導和平運動的，然而我們這一次却是要由淪陷區來領導和平運動。只有在淪陷區的和平工作緊張起來，纔能影響重慶政府統治下之內地民衆，使之脫離重慶政府的威脅，來與淪陷區民衆共同完成和平救國的大事業。

有人說，在淪陷區做和平工作不是很容易爲日本軍隊所劫持嗎？我們以爲這一點是完全不用担心的。關鍵在於：我們說的是由淪陷區的民衆來做和平工作，不是由駐在淪陷區的日本軍隊或只知討好日本而忘記祖國的老爺們來替我們做和平工作。從來只有亡國之官，沒有亡國之民，因爲民衆是不可屈服的，不能被劫持的，屈

服與被劫持的倒是不負責任的政府及其官僚們。不負責任的政府及其官僚們即使居住在崇山峻嶺的內地，有幾道防線保護著，也還是在隨時準備屈服，並且自願被劫持；對誰屈服呢？對不負責任的國際調停屈服；被誰劫持呢？被不負責任的國際調停所劫持，要是國際調停竟然成功的話，我們可以打賭，重慶政府是會連條件都不看一看就接受和議的。結果便是輸了給日本人，同時又輸了給作國際調停的列強。至於民衆，無論他們是在內地或在淪陷區，他們是不會屈棄於任何勢力或被劫持的，他們不會做國際調停的傀儡也不會做日本的傀儡；也只有中國的民衆尤其是在淪陷區的民衆自動負起和議的責任，纔能獲得日本方面的敬意。以平等的精神談判條件。這裏的要點，只在於淪陷區民衆應當注意到如何有效地監督他們自己所成立的和議機構及他們自己所願望的和議方案之進行，使之不至於落入政客軍閥與流氓的手中，這纔真正能够做到不被日本人所劫持，也不被國際調停所淆惑。又有人說，現在淪陷區內還是亂七八糟，連日常問題都不能解決，諸多刺激，又怎能進行和平運動呢？但我們以爲和平運動環境不是自己會出現，擺好在那裏等我們去做和平運動的。我們不能等到淪陷區裏的各種問題，例如日本兵待遇中國人的這一類麻煩統統自行消滅之後，纔舒舒服服的回到淪陷區來做舒舒服服的和平工作；我們只有即刻回到淪陷區來並且即刻進行和平運動，纔能把上述這一類日常的麻煩解決。

淪陷區的同胞們！現在重慶政府既然不對你們負責任，並且不對整個中國的命運負責任，你們只有和全國的同胞一致站立起來，要求淪陷區民衆的權利，並且要求整個中國的命運的保證！我們在汪先生的領導下，一定遵照民衆的要求而努力，民衆應當知道，目前的僵局再拖延下去，淪陷區的危機是在一天比一天加深的。大家只要想一想，過去中國的海關及若干交通機關的主權是如何損失的？那一次不是因爲軍事混亂局面延長的緣故，中國對上海等地管理不到，海關纔由外人代管而終因既成事實而完全斷送，又因爲軍事混亂局面延長的緣故，中國交通工具遭了阻礙，外國人的商船纔獨佔了幾條最重要的內河航線。現在因爲有負責機關的緣故，淪陷區的權益一邊由於與日本作非正式的就地交涉，遣失了許多，一邊由於坐視列強把淪陷區的權益作成一次又一次的局部妥協，又損失了許多。這些損失了去的權益變爲既成事實之後，我們將來要想收回便很爲難，這不是糊裏糊塗的斷送了嗎？

我們現在是要收復淪陷區，並且要收復後的淪陷區仍能保留並且發展其爲復興中國的人力物力的基礎。要收復淪陷區現在只有藉和平的手段。因爲用無底抗戰去收復失地，事實已證明其爲不可能了。要使收復後之淪陷區仍能保留並且發展其爲復興中國的人力物力的基礎，只有趕快作成和議，愈快愈好。淪陷區民衆已往曾經

是抗戰的最前線，表現其爲強毅不屈之戰士，現在則是站在和平的最前線，應當表現其爲負責任的政治羣衆，並且從這裏產生出革命領袖，產生出和平的行動機關。

上海工商業自救之道

曉峯

自從上海變成孤島以後，一般人都以為上海的工商業必將陷入極端困難的境地，然而事實却出乎吾人意料之外，在過去一年中間，因為各地戰區有產難民的逃來上海，人口激增，消費力增強，反出現了未曾有的畸形景氣。就工商業的本身來說，總算不幸中之幸了。可是這種景氣，也不過曇花一現，并非可以繼續存在的，目前的上海工商業，却已遭逢着嚴重的危機了。

第一，過去一年來上海工商業的繁榮，是依靠於逃難者的消費力。這種消費力是沒有生產做基礎的，經一度的消費，即歸消滅，不管逃難者帶來了多少金錢，經過長年的消費，終有告罄之一日。而托賴不健的消費人口發展的工商業，也就勢將隨難民消費力之減退，而歸於衰蕪。這種情勢，在最近幾個月中間，已表現得十二分明白了。

第二，重慶政府，藉名抗戰，再三再四地要求上海工商業界承銷巨額的公債，而既承銷的公債的本息，則停止償還，或設種種方法，限制上海公債所有者的直接取款。換言之，對於抗戰經費，則予取予求，對於工商業者的債務，則棄之不顧，

試問上海工業有多少的資金，可供這無窮期的誅求？工商業的發展，原靠有充分的流動資金以資週轉，今資金既已爲重慶政府之一道限制提存命令而被封鎖，這豈不是自絕了工商業的生機？

第三，自抗戰開始以後，至去年三月實行管理外匯爲止，我國外匯，還能維持官定價格，自那時以後，外匯雖開始暴縮，然至今年六月間，外匯黑市，也還能維持對英八便士的水準，而最近則由六便士半而落至四便士半，更由四便士半，而落至三便士二五。外匯緊縮之急，誠有令人驚心動魄者。自來工商業之發展，常賴有穩定之匯價，今外匯暴縮若此，助長投機家之活動則有餘，對於正常工商業的發展，幾乎等於絕望。

第四，工商業的發展，原賴乎健全的消費力，最近因爲外匯暴縮，紙幣發行膨脹，物價已開始破天荒的騰貴，上海市民的消費力，已在相對地減低，以僅有之生活費，購買最低限制之生活必需品，尙虞不足，更有餘力購買非生活必需品？消費力既已相對地絕對地減低，試問工商業自身還有什麼發展的可能？

造成上海工商業的危機的，此外尙有三個原因；第一個原因，上海失陷後華資工廠及商店之遭劫奪，破壞，停閉者，迄今不得恢復，以致上海工商業的生產力大爲降低。第二個原因，上海工商業向內地運銷，淪陷區的問題一日不解決，交通

即一日不恢復常態，內地即一日不能恢復其購買力，而商品即一日不能暢流，以致上海工商業的銷路窄狹不堪。第三個原因，上海失陷迄今，正當交涉之途徑一日不開，上海工商業之投資問題，關稅問題，銷售問題等等即一日不得解決。例如在日軍控制下之區域，工商業幾全入日人之手，華方完全失去競爭能力。又如英日局部妥協之關稅協定，有損於華方工商業，爲盡人皆知。又如長江通航問題至今成爲懸案，一切須假手日輪，便一切須讓位給日貨。

綜上所述，上海工商業危機之挽救，實有待於整個國家危機之挽救。要想挽救上海工商業之危機，必須做到：一，安定金融；二，免除戰費負擔；三，培植購買力；四，收回並恢復被掠奪，破壞，停閉之工廠商店；五，恢復與內地交通之常態；六，以正常交涉釐定中日經濟關係，改建國際資本關係，及修正關稅條例。要做到六樁大事，便不能放任蔣介石無底妄戰下去。如果放任蔣介石無底妄戰下去，金融只有更動亂，以至於全部破產；戰費的負擔只有更加重，以至於資金耗盡；購買力只有更低落，交通只有更阻塞。如果放任蔣介石無底妄戰下去，被劫奪，破壞，停閉的工廠商店必不能收回，現行臨時關稅條例必無法修正，外資關係必無法調整。我們深信，只有實現汪先生領導的和平運動，以上各點才能通過正常的外交談判手續而得到解決。現在汪先生既在領導國人先從廣東做起局部的停戰，我們正應跟

着在江浙方面也來做起局部的停戰，即刻進行恢復交通秩序，即刻釐定對外商務關係及資本關係，並且即刻進行改建貨幣制度，重新安定金融。

根據以上認識，上海工商界應當奮起，並且領導全國工商界，與蔣介石之無底妄戰斷絕關係，而以全部力量推進汪先生領導之和平運動，要堅決的做，要馬上就做。

敬告撤退的同胞

孟容

自從前年八一三戰事發生以來，多數國民，受了共產黨的虛偽宣傳，就形成了一種歪曲的信念，好像地方上一發生了軍事問題，就得遠走高飛，只要多遷延一天，便似做了一天人家的順民一般，就是公務人員，第一批先走，也只居撤退移轉的美名，從來不負守土逃亡的責任，至於此外各級人民，更是受了這種影響，往往連沒有搬家財力的人，也常在那裏流離遷徙，他們那時，受了一種衝動，說得好聽些，似乎一身繫國家的存亡，若非他們到內地去，努力建國，這國家就要滅亡，說得不好聽，就是獨善其身，鴻飛冥冥，自己先覓個比較太平點的地方再說。

我們對於這班撤退的同胞，分析起來，就發生了三種觀念，第一種誤受宣傳不自主的人，我們加以非常的同情，因為他們雖是目光較淺，却是志行純潔，往往連旅費都是展轉借貸而得來的，第二種富有資產逍遙海外的人（香港爲英屬，當然也在海外之例），我們不得不加以鄙視，因為他們早已資金逃避，布置從容，却還要借這國難時期地方軍事的關係，博得一個愛國志士的頭銜，以自鳴其地位的重要，實在是令人可鄙，第三種對於社會上業務上負有責任的人，也以一走了事，那是我

們不能不加以責備的，因為他本來執行了很重要的職務，負著了社會上一般的責任，地方雖然發生變化，人民社會，還依然是人民社會，那豈可以拋棄了一切，而自己退處於安全的地點呢。

除了這上述三種人以外，還有自己本身經營着較大的企業，在這軍事擾攘的時候，糾紛當然很多，可是一不肯任勞，二不肯任怨，三也不肯再拿出資本來維持事業，在這幾種情形之下，也就打在盲目愛國的賬上，『買棹遠遊』，另行打算去作開發內地的計劃，等到後來計劃終不過是紙面的文章，而自己的企業，因為廣田自荒的結果，反為人家做了工具，越到後來，越難料理，也只得仰天長嘆，付諸東流，豈不可惜。

我們應該知道，在這現代國家的精神上看來，我個人的學問智識，就是國家的文化，我個人的企業，就是國家的資源，我隨便犧牲自己的精神物質，就等於斲喪國家的元氣一樣，我們的土地，雖然受着了一時軍事的影响，可是我們豈能認他為已經淪陷，我們只有更加勵精圖治，希望趕緊脫出了這軍事影響，恢復我們的國權，我們更只應該設法保全了自己的產業——國家的資源——預備作為將來復國的張本，我們已經上了共產黨的大當，高呼焦土政策，結果恭候人家來造無數的新房子，高呼撤退戰區人民，結果減少了自己無數的生產，我們要知道開發內地是新興的

事業，當然贊成，可是萬不能在新興事業未經完成以前，就先毀滅了已成事業，正如一個人在新房子沒有造成的時候，就先拆了老房子，叫他何處去安身呢。

所以我們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上，應請撤退的同胞，深思熟慮，不要中了共黨的中傷，不要憑一時的意氣，自己荒蕪了田園，自己廢棄了企業，反而留著去做人家的工具，在戰事真正劇烈的時候，因為難於辦理，撒手一行，已經是消極無法的最後一著，有些對不住國家，到了今日，好多地方，已經不在戰事範圍裏面，何況和平的空氣，已經有醞釀為事實的必然性，我們的領導者汪先生所主張的獨立政權，也已經為目前軍事對像的日本朝野所承認，我們只要在和平的大道上走着，我們靠著自己的獨立政權，豈不即想回復我們的生產能力，生產利益呢。

撤退的同胞，尤其是負著社會事業的責任者，自身企業的經營者，你們流離異地，兩年以來，對於自身，並沒有什麼結果，可是對於國家社會，已經失損不少，你們因為一時的愛國心所驅使而離開了鄉土，你們更應該因為永久的愛國心所驅使而回返到故鄉，我想光明的大路，日近一日，希望大家趕緊打點行裝，回到老家來，共負救國的使命，復國的責任。

岐視淪陷區內人民的錯誤

諸 彌

八三以來，戰每失利，轉移陣地之舉，不一而足，失地愈多，日軍佔據之範圍愈廣。於是全國土地劃爲二類：仍能保持原狀者名曰內地；其爲日軍所佔據者，則稱爲淪陷區域。此等失地，多爲名都大邑，日軍駐守其間，祇屬一時的佔據，斷不能認爲歸其版圖。縱使不能戰勝，仍可藉和平手段收回。目前雖告陷，究爲中國領土。故居斯土者依然爲我同胞，當軍隊退出之際，政府既不能設法盡爲移徙，則此類無告之氓，只得仍留原地。縱有少數民衆，隨軍西撤，欲覓棲身之所，已苦無從安插。重慶政府果能將淪陷區內之一二百兆人民，悉數移徙西南，西南數省，使其有賓至如歸之樂乎？是故大多數民衆，仍留淪陷區內，勢所必至，理有固然。既須留居故土，自當各謀生計，農不能不從事南畝，工不能不勞力糊口。若斥其爲順民，苟全性命，是不啻責人爲夷齊，而自忘其喪師失地之罪，有是理乎？有是理乎？全國土地雖有淪陷與否之別，其散居各處者，同屬中國人民，萬無歧視之理。乃觀重慶當局設施，竟有大謬不然者。在彼等心目中，一若淪陷區域，已非中國領土；在此區域內之居民，已非中國人民；謂予不信，試以若干實例爲證：

游擊政策，本爲牽制日軍後方而設，今則散兵游勇，假借名義，殺敵不足，擾民有餘；一般鄉民曩遭兵燹之禍，今又受游劫（俗指游擊游劫）之厄，相率避難，麇集市垣，呼籲無門，甚爲悲慘，軍事長官則熟視無覩，不予制止，豈非縱容盜匪荼毒良民耶？此其一。淪陷區內所產物料，及華廠製成貨品，向銷內地，以應需要；今竟認作敵貨，禁其輸入，貨物銷路減少，內地則供給不繼，物價騰踊，豈非雙方俱受其害耶？此其二。日商強迫華廠合辦，華商力不能抗，忍受痛苦，游擊隊則不問情由，輒加破壞，或竟焚燬，所被毀壞者，實爲同胞財產，此非自殺而何？軍事長官對於此等暴行，未聞予以制止，殆竟默爲贊助耶？此其三。內地貨物銷行全國，今則禁止輸入淪陷區，以致有無不得相通，彼此交受其困；例如沿海數省，糧食不足，內地有餘，本可挹注，今施行遏糴政策，有餘者徒致腐朽，不足者取諸海外，適以促成入超，以致外匯奇縮，此其四。資金流通自有定理，人民有餘資者，大抵麇集東南，不願投諸內地；當局雖曾種種設法，獎勵內流，都歸無效，乃對上海一埠實行限制提存，以便收縮通貨，託詞防止資金逃避，豈知愈限制則信用愈失，存戶一經提出，不再存入，或竟改存洋商銀行，或仍時轉購外匯，匪特不能使其內流，反致促成外溢矣。通貨收縮以後，工商業務停頓，物價日見騰踊，開源乏術，節流無方，人民謀生愈艱，負擔益重，全國瀕於破產，內地豈能倖免，此其五。

要而言之，當局既不能戰，又不言和，遷延莫決，坐失時機，反視國土爲域外，誤認受難同胞爲化外之氓；倒行逆施，使吾民痛苦益深，國家元氣，斷毀殆盡，課以誤國殃民之罪，其又奚辭。

上海民食問題的癥結

孟容

「民爲邦本，本固邦寧，」這兩句原是老話，可是按之現代政治學的解釋，是一些不錯的。我們中國人民，既然爲中國之國本，可是這本是固還是不固呢？我們不要說遠的；且看上海的生活程度，貨價飛漲，就不問可知，尤其是「民以食爲天」，現在一担米要賣二十九元，就可以反映一切一切的情況了。

米糧的漲價，大概不外乎兩個因素：一是內地的米不能出來。到貨缺乏；一是幣價低落，大家囤積，不肯輕易脫手。爲什麼內地的米不出來呢？這是一因軍事期間，產米的區域，都已淪陷，所以受了人家的統制；一因中國自己的政權，不能行施於淪陷區域，所以弄得各地各自爲政，捐稅重重，運輸失常。爲什麼幣價低落，大家囤積呢？這又是一因外匯飛漲，人家不願以值價的貨物，換取有名無實的法幣；一因貨物上漲，可以限隨幣值，隨時結算，囤戶的心理，看了囤米，等於買外匯買金條一樣。可是因爲這四種因素所造成的結果，就成了二十元一客的包飯，實現了「民不聊生」的景象。

現在上海已是無人不注意到這民食問題了。或是勸囤戶平價脫手，可是囤戶絕

對不願輕自犧牲；或是勸公家販運洋米，可是外匯飛漲，洋米的價格，也是日新月異；或是設法疏通內地的來源，可是軍事期間，又不容易商量出方法來。於是大家只有開會研究，而始終沒有具體的辦法，米價也就由二十元一担限制，到了二十九元了。

總而言之，一切的一切，上海人民，應該知道這是整個的政治問題，而不是單純的地方民食問題。假如淪陷區域，有了合法的獨立政權，同時進行了平等的和平交涉，那麼這產米區域的軍事期間，當然很快就可以過去的，軍事時期一過，自己對於捐稅，有一定的標準，對於運輸，有敏捷的方法，米的來源，就不成問題。到貨一湧，米價自然跌落，就連囤米的大戶，因為獨立政權對於貨幣，必然有新規定，只要金融安完，便屬無奇可居，也自然急於脫手，又可促成米價的跌落。

我們固然知道，單只使人民不吃貴到二十九元一擔的米，當然不能算達到固本的程度。可是假如使人民常常吃二十九元一擔的米——或是價值更大的米——那就毫無疑義可以促成整個社會於破產之途。我們也知道一班有心人士，與負責當局，對於民食，都極端的注意，千方百計的設法，可是我敢說一句，大家所想的，都還是治標的方法，偏偏這病根是在本上。所以方法雖好，終不靈驗，現在趕緊地讓我們來談談治本的方法罷。

時到今日，獨立自主的政權與平等的交涉，業經汪先生大聲疾呼於前，全國各地人士響應於後。現在這個理論，已是人同此心，沒有絲毫疑義的了。現在所要推進的，就是具體的行動，但只使行動早一天推進，人民就早一天得解倒懸，國家就早一天獲得安定，不要說這上海局部的民食問題，就是連整個中華民國的民生問題，也都迎刃可解。

所謂具體行動，要列舉起來，千頭萬緒，決非三言兩語，所可說完。若是僅僅說一個大概，那就是大家既然知道抗戰之只能亡國，不能建國，就應該在和平的道路上，去謀建國。中國在現階段上，既還在以黨建國的過程中間，凡屬黨員負荷了政治上更大的責任，更應該首先出來，擔任艱鉅，按照黨章的規定，召集會議，然後再進一步集全黨各派的人才，共同從事於最高的政治組織，來把握政權，來充實政府，來交涉和平，來解決對內對外的各種問題。我敢相信，只要一經推動以後，整個國家的經濟機構，民生問題，就立刻可以發生好轉的影響。我們希望達到「本固邦寧」的境界，可千萬不要錯過這第一步的千鈞一髮的時機。

倚賴的外交政策之失敗

夢賢

自華盛頓會議以來，我國即苟且偷生於九國公約之下，從無獨立的外交政策。一個國家靠着一個國際公約而生存，已够可憐，何況簽字九國公約的國家，並不願出力來維持這公約呢？

西洋各國在華的利益之最大的，首推英國，然「九一八」事變發生，美國有意干涉而美國不願，似乎九國公約之被撕毀，與她風馬牛無關。迨至日本在滿洲造成所謂「既成事實」，而由英國主持的國聯雖派代表團考察一次，然始終無法解決。從此以後，我國當局仍不覺悟，依然恃着已成具文的九國公約和毫無實力的國聯，而不願與日本直接交涉，解決中日間的一切懸案；屢次拖延，以致產生「七七」和「八一三」以來的戰禍。所以中日戰事的發生，是我國當局底倚賴的外交政策之賜，毫無疑義。

「七七」事變發生，我們在華北方面的抗戰，「八一三」以後，我們在淞滬的抗戰，都是我們應有的表示，使日本方面明白中國不是可以武力征服的；然到上海失守之後，日方既託德國大使陶德曼提出議和條件，這是停戰戰爭保全國力的最好

聚會。而當軸還是希望英美等國出來維持九國公約和蘇俄底參戰，拒不言和。京南失守之後，日方又託陶德曼大使提議言和，當軸仍然執迷不悟，倚賴所謂『民主陣線』的國家，拒不容納。漢口失守，遷都重慶之後，近衛發表宣言，提出三原則，而蔣氏照樣不睬，依然一再請求國聯援助和乞憐那些所謂『民主陣線』的國家；雖高唱『抗戰到底』，然實際上則一籌莫展，讓舉國成爲焦土，讓人民流離失所而已。

我們要知道：九國公約所謂保全中國底獨立和主權都是保護她們自己在華的商業利益的一塊假招牌；如果中國失却了獨立和主權而她們在華的商業利益仍保全一部分，她們決不會爲維持中國底獨立和主權來賣氣力。試問抗戰以來，英美對華的借款，區區數百萬鎊和數千萬美元，是有意幫助中國嗎？單就今年頭三個月論，美國對日的出口貨僅三十萬鎊而輸入的日本貨達二百五十萬鎊，美國在近兩年中供給了日本的大批軍用品：請問這是英美援華嗎？

英日在東京談判，英國宣言承認日本在華作戰的事實，并聲明不妨礙日本底軍事行動；重慶方面聽了，就焦急起來。日前美國聲明廢止日美商約，重慶方面聽了，又快活起來。實則美國之廢止日美商約，無非爲保障美國在華的利益而豫備與日本講價還價，并不是幫助中國。像重慶方面的態度，我國底生存全靠歐美各國底對

日政策，這是不是倚賴的外交政策呢？據已往的事實看來，這種倚賴的外交政策，實在是亡國的政策。

再拿聯俄政策講，像孫科一派，天天夢想着蘇俄出來對日作戰，以為中國可以在日俄戰爭之下，暫時偷生。不知蘇俄是和英美一樣，自有其國策，決不會為援助中國而對日作戰，這是很明顯的。老實說，在現在情況之下，即令蘇俄因她自己的利害而對日作戰，結果，與中國無絲毫好處；蘇俄打勝了日本，必赤化中國；日本打勝了蘇俄，中國還有什麼平等議和的資格，簡直就做了朝鮮第二。何況從蘇俄底國策言，因日俄衝突的不可避免，蘇俄固希望中國對日長期抗戰以消耗日本底實力，然絕不願犧牲她自己底實力的。試問抗戰以來，蘇俄已接濟中國的飛機軍火，所值幾何？真正的援助是這樣的嗎？去年張鼓峯事件，蘇俄與日本一面打，一面交涉，竟妥協了。主張聯俄的人，還不覺悟，還想靠着蘇俄對日作戰而求中國底出路，這與倚賴英美底強硬對日而求中國底抗戰勝利，同是亡國的政策。

英國今日可與日本直接談判，我國何嘗不可與日本直接談判呢？去年張鼓峯事件發生之時，蘇俄可與日本直接交涉，我國為什麼不可與日本直接交涉呢？日本至今尚未對華宣戰，又有近衛底三原則，昭昭在人耳目，我們應別開九國公約，別開所謂「民主陣線」的國家，一致擁護汪先生底主張，與日本直接交涉，直接談判，

解決中日間的一切糾紛，重新樹立東亞和平；這確是救國的獨立的外交，而不是亡國的倚賴的外交。

遠東外交的醞釀

劉靜

七月十五日英日東京會議開始以後，我們就很肯定的說；這一次英日談判必有成就，（現已告成五項協定）因為現在的國際情勢與兩年前英日在倫敦會談時不同，遠東的狀況與兩年前也不同。在兩年前國際情勢緊張，遠東情形，尤為緊張，在兩年前列強誤認蘇俄是國際間一個建設力量，現在都認清她是國際糾紛的策動者，在兩年前歐美各國都誤以日本將兼併中國，摒歐美權益於中國之外，現在都明白日本不欲且不能兼併中國，尤無獨佔遠東市場的意向，恰在這個時期汪先生領導着全國愛國志士努力於中日和平的實現，這種努力具備必成的客觀條件，擁有全國一致的內心要求，和平實現的時間，就是中國復興的開端，這種新的事實，列強不能熱視無睹，她們不能不針對現狀作外交上的預備。

英國在遠東的利害關係最深切，而她對於情勢演變的觀察也最透澈，所以她首先同日本開始談判，保持住目前的權益，培植下對華外交未來的基礎，假若中日和平業經恢復了的話，中英外交也必然是走上了一個新的階段，在目前情勢之下，她祇好留一個餘地，我們也祇好作一個未來的打算。

英日談判開始以後，其他國家對於遠東外交有些什麼活動呢？就報端所公表的，是法日商約的締訂，是日美商約的廢止，是德日商約的簽訂。法日商約的締結，與英日談判互相應援，德日商約的簽訂，據報端所傳，因為美國對日宣佈廢約，德國故意聲援日本，對抗美國，此乃陣線論者一貫的腔調，殊不知德日商約的談判已非一日，並不是突然而來的。至於美國宣佈廢止美日商約，表面上具有破壞性，實際上具有建設性，這祇能算是一種外交戰，合英法德對日的外交戰略不同，而她的目的却是毫無二致。

我們早料到英日談判獲有成就以後，美日外交必然發動。七月二十七日華盛頓傳來廢止日美商約的消息，我們立刻想到美國對日宣佈廢約，等於日本對英封鎖她在天津的租界。日本不封鎖英國天津租界，英日談判發動不這樣快，美國不對日宣佈廢約，美日遠東外交的新局面也不能展開；這並不是說，日本封鎖天津英租界，日本比英國強硬，而美國宣佈廢止美日商約，美國比日本還強硬。『強硬』不『強硬』在勢均力敵的國家，本無意義，祇能說這種舉動都是運用外交的必經手段，站在什麼場合，碰到什麼時間，運用什麼手段，在外交入了軌道的國家，幾乎是毫無變動的。

對遠東關係最密的國家，英國以外，美國要首屈一指，經濟方面，自九一八事

變以還，她對日的貿易數字逐日上昇，對華的貿易數字逐日下降，在這一中中日戰爭中，美國也是日本戰時原料品的最大供應國，兩年以來英國輿論對於吾國極表同情，而美國輿論反每較偏向日本，經濟關係，是其中最大的原因。政治方面，日美兩國却不斷的發生摩擦，尤以歐戰以後爲甚，巴黎和會席上及一九二一年的華盛頓會議，致使日美關係極端惡化，而其結果，造成了東亞不能安定的局面，中日積不相能的情勢，終其極釀成這一次悲慘戰爭，現在中日兩國都覺悟了，她們要携手共謀東亞常久的和平了，加以機警多謀的英國首先認清這些客觀的事實，美國那能不兩步併一步的趕上，爲她在遠東的利益奠定一個新基礎？

有人說日軍在中國侮辱美僑，引起華盛頓方面的憤慨，所以對日宣佈廢約，試問炸沉軍艦不比侮辱僑民更嚴重嗎？又有人說美國有意援助重慶繼續抗日、試問戰爭開端的時期，美國不藉此援華抗日，等到現在中國人民嗚嗚望和的時間反來援華抗日，世界上有這種不識時務的國家嗎？美國廢約是對日的一種表示，來得很急遽，性質却很緩和，這種表示除却試深日本對美的真實態度以外，還爲即來的新興中國隱伏下正常的外交關係。第一，她要試深日本不妨害中國主權領土完整及維持中國門戶開放歷次聲言，是否具有誠意，是否肯拿事實來作個約束。第二：她要試深日本是否具有南進的決心，她知道日本的陸軍足以對俄，日本的海軍足以控制太

平洋西部以至黃海全部廣大區域，非但對菲律賓，如探囊取物，就是美國本土也會受到她的新銳海軍的威脅。美國雖以常情判斷，認為日本對華問題得到合理解決以後，沒有發動這種戰爭行為的必要，但是公忠謀國的政治家，計劃必需很周密，圖謀必需有把握。七月二十六日美國國務卿赫爾向新聞記者宣佈廢約的動機，據謂「此約載有現需要新考慮之條款，美國欲廢止此約；以期隨新發展之需要，對於美國利益，予以更好保障與足進。」所謂「新考慮」，所考慮的是什麼？我們在前文業經叙及，而其所考慮的具體事項，非日美當局不能知其詳所謂「新發展」這明擺着急遽演進的中日關係，及其直接影響到的日美太平洋關係。赫爾宣佈的語句極平淡極圓到，但是受命於第三國際的陣線論者，照例藉題發揮，說什麼美國經濟制裁日本，說什麼英美將聯合制日，說什麼美國支持重慶抗日，他們在這裏亂發噱語，而歐美各國有識之士就在那裏作正確的說明，七月三十日倫敦太晤士報的社評謂：美國對日廢止商約的舉動，在照會中說得清楚，如果故意造作更多的解釋，實屬不智。這雖是勸告英國反對黨的語調，吾國陣線論者看見也應當思考一下吧！

總之，英美德法四國在以往半個月內對日外交的措施，充分表現她們對於遠東現勢的認識，她們在遠東的權益，要從日本方面各自重新得一個保障，她們於實現和平復興民族的新中國，要佈置下一個遠大的基礎，所以英首相張伯倫氏一再聲明

美國不改變對華政策，日本也未會要求英國改變對華政策，所謂對華政策，指對中國而言，現在代表中國的是和平勢力，英國自不能放棄和平自主的中國的邦交，他又說，現在對日妥協是對於事實的說明，這就是說英國對於中日的和平關係業已瞭解，不過尚未進展到承認的階段，同時日首相平沼氏聲言『我們不要求英國對於遠東的新事實，現在就加以承認。』這尤附合日本政府不侵害中國獨立完整的歷次宣言，英國的態度如此，法德的態度如此，美國採取的手段雖不同，而她抱持的態度與目的，又何嘗二致！

七八個月的和平奮鬥，在對外關係上，可以說是取得了十分的諒解，我們惟一的阻礙就是第三國際指導下的中國共產黨，我們需要和平，就必需剷共，共產黨作祟，是必然的。我們惟有聯合全國同胞急起奮鬥，樹立中日和平，重建外交關係。

英日談判之於重慶政府

予愚

因爲重慶政府對於抗戰最後勝利自己都沒有把握，所以便特別看重了英國的態度，看重了自法幣政策施行以來是中國對外政策的主宰的英國的態度。

重慶政府衷心裏希望英日談判變成遠東的慕尼黑會議，這樣他們可以諉卸責任，把抗戰未能得到最後勝利的責任，推到英國身上。但是，在宣傳上，却不能不表示反對英日談判，以圖欺騙民衆，以爲將來諉過的根據。

因此，在英日談判初開時，重慶便表示關懷，有田克萊琪協定發表，便表示失望。白銀問題與引渡嫌疑犯問題一上議程，又表示恐慌。哭秦庭式的呼籲美國停止談判的呼聲，在大大小小的發言中與報紙上，流露出來。美國廢止了美日商約，又表現爲一團高興，請求禁運軍火的電文，發向美洲去，籲請英國仿效美國的請願書，又遞往倫敦。

但是，重慶政府究竟願意英日談判破裂嗎？決不。他們正在祈禱英日談判之變成慕尼黑會議，真心反對英日談判的倒只有共產黨。他們爲執行莫斯科的命令，爲維護他們的新四軍，八路軍，鞏固他們的大大小小的『邊區抗日政權』，絕對要反

對英日談判之變成慕尼黑黑會議！

究竟英日談判，是否會如重慶宣傳要網上所希望的早些停止或決裂呢？是否會如重慶要人們馨香祝禱的變成遠東慕尼黑呢？

兩個問題的答案，都是一個『不』字。宣傳上要失敗，私心的要求，也不會實現。英日談判，將順五着美日基本外交的政策而或遲或速的進行着，但終於不能解決遠東的局面，不能根本決定遠東的新均勢。

英國對於中日衝突的根本態度，自開戰以來，張伯倫與哈立法克斯，都說過多次，即隨時準備以『公正的態度』中止這次糾紛，結果這次戰爭。這是說，英國始終準備調停中日戰爭，這是重慶政府幻想的由來。

可是，英日談判擱淺了，重慶政府所幻想的遠東慕尼黑黑會議沒有來。原因是，美國突然宣佈廢止美日商約，這使英國對日妥協失却了自由。然而因此，重慶政府卻由幻想走上妄想了。這個妄想就是：遠東慕尼黑黑會議雖然沒有來，但要是英日決裂了，又有美國在那裏強硬，情形於中國也許會好。怎麼好法呢？或者是英美將和日本過不去了，或者是將由美國代替英國出來領導遠東慕尼黑黑會議，調停就在眼前了。

事實呢，美國不見得會和日本過不去，英國也不見得會和日本決裂，英美攬在

一道的國際調停也不見得會有成就，重慶政府且慢高興。

美國以廢止美日商約爲推進美日妥協的手段，猶之乎日本以反英運動爲推進日英妥協的手段。所以說，美國不見得會和日本過不去。英國則只是爲了適應美國，把英協妥協放緩一下，以爲調整英日妥協與英日妥協的步驟。所以說，英國也不見得會和日本決裂。因爲有了美國，英國在遠東不能像在歐洲那樣幹她的慕尼黑會議，但美國在遠東諸勢力的對比中尙未能確定其爲支配者，美國尙缺少一個據點以爲採取何種斷然行動。所以說，由美國領導的遠東慕尼黑會議也不見得會來。

而且，重慶政府之附著於英國，已無可移轉。英國在遠東的支配地位的失却已是不可避免的，因而重慶政府這個硬殼果之被敲破也成爲不可避免的。不但日本提出了打倒蔣政權的口號，美國要改變中國之對外關係，也沒有支持蔣政權的斷續存在的理由。站在中國的立場，英美日之間的這種錯綜關係並不是無可運用的，然而站在蔣介石及其御用的重慶政府立場，則只有被英美日之間的這種錯綜關係所壓碎。

美日商航條約廢止

若 耶

美國宣佈廢止美日商航條約，是爲了對付英日妥協，但並非拿這當作解決中日戰爭手段，只是拿這當作延宕中日戰爭的手段。要在北京會議時，美國代表台維斯就會說過：「除非中國政府有了崩潰的跡象，否則不應以停戰爲第一義。」美國不願意在她所認定的時機到來之前結束中日戰爭，雖然她所認定的時機並非「中國政府有了崩潰之跡象」這一句話所能簡單說明。這次英日圓桌會議是在美國所認定的時機尚未到來之時舉行，而且是採取英日單獨妥協的方式，所以美國要顧忌，要作難

對於英日圓桌會議，美國顧忌的有兩點，第一點日本要求取締在租界內之華方銀行經營出入口貿易，交出在租界內之中國現銀，禁止法幣在華北流通，並要求英國與華北聯合準備銀行合作；英國如果答應了，就會引致法幣的全線震動，中國金融的支配權力將從英國手中轉移到日本手中。美國也願意這種支配權力從英國手中掉下來，但不願意被日本接了去。這有一段歷史可以參考。法幣政策原爲英美貨幣戰爭的結果之一，當初美國提高銀價，促成中國白銀外流，英國纔來幫助中國制定法幣政策。法幣政策剛剛制定，歐國又貶低銀價，以爲打擊，當時美國議員湯

生公開宣稱，謂『吾人何必維持白銀價格去替英國解決難題』，英國無法，乃授意中國派遣陳光甫赴美，答應從外匯基金十二億元中提出四億元存在紐約，美國這纔適可而止。但外匯基金存在倫敦者爲八億元，比較存在紐約的多出一倍，而且法幣外匯是與英鎊聯繫，不與美元聯繫；故中國金融的支配權力仍在英國而在美國，美國對之固未嘗忘情。前昨倫敦泰晤士報金融評論，謂美國仍然無意與英國合作以維持法幣，其意可知。美國不願幫忙英國維持法幣，但也決不願意幫忙日本支配中國金融。本此詣趣，美國仍不從正面入手，幫助英國抵抗日本之要求；而從側面入手，制止英日圓桌會議上之私相授受。

第二點，英日圓桌會議的具體任務爲解決秩序問題及金融問題，但日本提出更廣泛的原則；一爲要求英國承認天津問題之一的背景，亦即承認東亞新秩序之基礎；二爲要求英日在天津問題上之妥協，原則上須爲普遍的，可以進展到中日問題的全面。這一來，英日圓桌會議雖還談不到結束中日戰爭，但其性質却可作爲結束中日戰爭之預備會議。不經過美國，而由英日單獨妥協來作成解決中日問題的方案，即使僅僅是一個序文，美國必不能聽任。一九三七年年底，羅斯福總統曾經交給英國一通諮文，謂『將來中日問題之解決，美國必居於極重要之地位』。我們現在還不能推測要到那一天纔是美國所認爲中日問題解決之時機，但當此英尙有可能妥

協而且尙在進行妥協的今日，美國的「極重要之地位」尙未自然出現，她就只有從牽制英日妥協入手，使英日妥協之機能卒因無數次徒然的努力疲勞，而耗竭。只有在英日妥協之機能完全耗竭之時，美國纔能在解決中日問題上頭居於極重要之地位。

基於以上兩點，美國的具體對策就是廢止美日商航條約。廢止美日商航條約，不過是作出了外交室強硬姿勢。論實施，須從明年一月二十六日起纔開始，這於當前以英日圓桌會議爲核心之中日局面，毫無緊急處理之效用，美國對於維持法幣問題之不置一辭，恰好證明了美國外交之缺乏積極的意味。此種強硬姿勢，與其說在對日本而發，毋寧說是對英國而發，它不過是對日本表示身份，但並不已經威脅日本；它博得了中國的好感，但並不會給予中國以實惠；它並不幫助英國解決問題，但它制止了英日妥協。制止英日妥協，就是美國廢止美日商航條約的惟一任務。因其如此，日本將對美國採取報復手段之說，我不信其會實現，而中國則不過空歡喜了一場。但英日圓桌會議則大有可能因此而流產。

爲什麼美國會給英國這樣大的影響呢？這裏不打算把英國關係作一分析，而只提起一些事實。八一三之役莫大使許閣魯受傷前後，英國會積極進行對日單獨妥協，這樣，羅斯福總統就來了一篇隔離侵略國的強硬演說，並且提議召開北京會議，

到頭，侵略國並沒有隔離。北京會議也並沒有作成調停，然而打斷當時正在進行之英日妥協這一層却給作到了。去年上半年，英日在長江通航問題上又準備妥協，在東京進行談判。美國遠東艦隊司令參魯爾突然宣稱美國艦隊決以武力衝破封鎖線。到頭，長江通航問題仍舊延擱下來，而打斷當時正在進行之英日妥協，這一層却給做到了。今年上半年寇爾奔走重慶，一時英日妥協的空氣又甚高漲，美國突然對上海租界問題作強硬表示，美國海軍並且首先發動在鼓浪嶼登陸。到頭，租界問題與鼓浪嶼事件糾纏如故，但打斷當時正在進行之英日妥協這一層，却給作到了。這次，英國在天津問題上又在進行和日本妥協，美國突然宣佈止美日商航條約，此其意義和以前的幾次並沒有兩樣。

英國希望以英日單獨妥協來結束中日戰爭，美國希望以美國為重心的英美平行調停來結束中日戰爭，日本希望以中日直接議和並利用英國的讓步來結束中日戰爭，中國則應當以中日直接議和並利用美國的抱負來取得比較有利的條件。我們主張中日直接議和，同時認為事實上將撇不開國際調停；然而要是沒有中日直接議和以為主體，國際調停便沒有一個寄托點，它將久久盤旋不下。中日直接議和成一成熟，國際調停就會趕到；美國到了當真參加調停的時候，她的態度將要沉着得多，因為這種調停將不是由對日本制裁而獲得，而是由和日本協商而獲得。像已往幾次及現

在那樣，美國的代表強硬只是延宕中日戰局而已。

九六

改建中日美三國關係

谷 生

美國宣告對日廢除商約，使中日圓桌會議之進行爲之停頓，我國一般淺慮者，又不免隨而高興，一若向所切望之最後塗利，已得一有力之保證，然我人忽忘九一八事變後，美國史汀生曾提出義正詞嚴否認滿洲現狀之聲明，然其實際效果如何？國際聯盟根據李頓調查報告所謂不承認滿洲國之決議，亦極聳動一時觀聽，然其實際效果又如何？此次抗戰事起，美國亦會根據九國公約主開會議於北京，我國人期待，何等殷切，然其實際效果又如何？凡此種種，徒炫惑我國外交當局，與一般國民惶惶於此種虛聲的道德的援助，而躊躇觀望於自力求生之應取步驟。此次美日廢除商約，我國如仍蹈襲以前覆轍，片面興奮，增加其種種倚賴幻想，而忘却美國舉國一致的厭戰畏戰心理，結果徒延宕中日戰爭的糾紛，（詳見七月二十九日本報社評），加重我四萬萬人水深火熱的痛苦；與五千年故國的益趨末日而已。

我人爲此言，並非蔑視美國，非但不稍蔑視，並且重視美國，同時並希望日本在與中國合作共同建設大亞洲主義的方針下，亦宜與我人同樣的重視美國，故其

爲：

一、中美日三國，同位於太平洋區域，水陸相望，休戚密切相關，中美日如能合作，不但復興東方事半功倍，並且這三個國家的合作單位可以影響歐洲，成爲維持世界和平之支柱。

二、美自開國以來，有極強大之國力，而始終未顯共侵略色彩，扶植菲律賓獨立一事，尤爲東方王道精神。

三、美國在中國未有租界，於亞洲更無殖民地，日本果能維持遠東門戶開放，美日間衝突即可消弭。歷來日本當局對美交涉，異常謹慎，此次美國片面宣告商約廢止，日政府仍守緘默，殆亦注意以上數種因素。然更從積極方面言，則

四、美國雄厚之資源富力，其對中國，更有比較深厚之文化補助，於復興東亞前途，關係特殊密切。

我人不願附和一般抗戰論者希望挾美以制日，以強美所不可能。但望中日兩國，取得相互諒解以外，還更取得美國的諒解來完成其復興東亞之大業。以我人心目中期待之復興東亞，其最重要之意義，不外下列數種。

一、爲中日兩國共具真正共存共榮，親善互助之信念。

二、日本助成我脫離任何國際間的束縛，造成一主權完整之國家。

三、中國全部資源之開發，其主權操之中國人，而與日本以互惠利益；但中日經濟合作不妨礙中國與其他國家經濟合作。

日本眼光遠大之政治家所揭櫫之東亞新秩序，其內容當不宜異是。中日如果共同向此種目標邁進，未必不可取得美國方面的諒解，美國一經諒解，則在抗戰未結束以前，中國大多數知識階級因篤信美國開國以來的精神，絕無侵略色彩，結成中日美親善關係，其於結束目前抗爭局面上，殊為極有力者。其次在抗戰結束以後，中國為培補抗戰創傷，不能不提供其極豐富之天然資源與人力，輔之以極偉大的機械設備，與極大量之外資。然機械設備與外資，純恃日本之助力，必有不週，環顧宇內，有游資可以利用，且用之而不貽政治上以憂慮者，無如美國。如是則以日本之工業技術與美國之資本扶助我中國開發其天然資源與勞力，東亞大陸不出二十年必為又一新大陸，解除歐洲各國對於中國的束縛，當不為難；而我對於蘇俄共產侵襲的憂慮，亦不防自止，是為吾人因美日廢除商約而引起改建中日美關係之觀念，我人此種觀念，並非倚賴美國勢力以支持抗戰，乃希望取得美國諒解以結束抗戰。並非倚賴美國勢力以制裁日本，乃希望取得美國同情以完成復興東亞。

國際軍事同盟之進行

若 耶

英法軍事代表團正首途赴蘇，日本駐德意大使同時會商日本參加德意同盟，照我們的看法，英法蘇軍事同盟與德意日軍事同盟都還是不可能就成立。

何以說英法蘇軍事同盟還是不可能就成立呢？因為，無論是英法，是蘇聯，現在都還在避免與德國為敵。都還在尋求對德妥協，而英法蘇軍事談判則不過是對德尋求外交的手段。起先是英蘇政治談判，蘇聯堅持須對波羅的海國家提供保障，這是故意為難英國，藉以討好德國，德國果然來了反響以巨額借款貸予蘇聯。這麼一來，英蘇政治談判便完全是替蘇聯作嫁，張伯倫在英蘇政治談判期間對德提供經濟合作，便不為希特勒所重視。張伯倫越過英蘇政治談判而為英法蘇軍事談判，無非要使希特勒明白，事情非拉蘇聯所行了，他必須尊重英國。然而希特勒依然不加以理會，他知道越過英蘇政治談判而為英法蘇軍事談判其前提已不穩固，即使成立，亦不過是過去法蘇軍事同盟之續而已。過去當法蘇軍事同盟之訂立正在進行中，希特勒進兵萊茵非武裝區之舉並不因之而有所躊躇；這次英法蘇軍事同盟即使在形式上成立，其關係亦將依然是不確定的，何況英法與蘇聯雙方都還在相互刁難，一面談

判，一面在看希特勒的臉色，只要希特勒對任何一方斷然作接受妥協的表示，軍事談判便隨時可以中途作罷的。至於希特勒之所以迄今不肯對任何一方作此種表示，則是因爲：希特勒現在還不想就發動大戰，現在他只想解決但澤問題，使但澤問題之解決不致引起大戰。要是希特勒現在就想發動大戰，他就必須迅速的甚至無條件的拉攏一邊，或者是英法，或者是蘇聯，至少要使之中立。如果如這樣，他對這次英法蘇軍事談判甚至早在英蘇政治談判開始之時就要有所表示了。但希特勒現在並沒有作這樣的打算。二次大戰的主動者將是德國，英法蘇則處在被動地位，只要希特勒現在還沒有把形勢看得嚴重，英法蘇軍事談判也就不會是嚴重的。也就沒有值得希特勒驚擾的理由，現在是，英法與蘇聯各在那裏借軍事談判對德國競爭拍賣，而德國則正在利用此種拍賣的競爭以求得最適當的價錢這個價錢就是誰願意幫助德國解決但澤問題，或對德國解決但澤問題採取中立，以消除德國所可能遭遇到的危險性，即是說，或者是張伯倫收回了他但澤問題提供的担保，或者是蘇聯表示不對張伯倫的這個担保合作以換取烏克蘭的安全，希特勒就可以接受妥協，張伯倫的，或是史太林的。由此可知英法蘇擬訂軍事同盟之談判的意義就在談判本身，而不是軍事同盟，這個談判將一直拖延下去，不是等待軍事同盟之出現，而是等待德蘇妥協或德國與英法妥協之出現。

何以說日德意成立軍事同盟還不可能就成立呢？因爲，日本現在並沒有打算對英國開戰，她只打算和英國妥協。日本現在並沒有感覺得英國的威脅，以致非對英國備戰不可；現在倒是日本在那裏威脅英國，但這種威脅也無須訴之戰爭。對英備戰的前提既不成立，日本參加德意軍事同盟便成爲沒有意義。日本也沒有打算到爲要對蘇聯備戰而參加德意軍事同盟，因爲德意軍事同盟本身現在還沒有確定它的對象，是對付英法的，還是對付蘇聯的。如果說日本有所顧忌，則只有美國。但日本正在避免刺激美國。日本爲了將來對付美國而參加德意軍事同盟，這是不會有的事，因爲日德意軍事同盟用以對付蘇聯或對付英法可以有它的價值，但如用以對付美國，則由於地理上的關係，而且由於德意同盟本身只能在蘇聯與英法當中擇一對象，未嘗想到以美國爲對象的緣故，日本參加了，也只能刺激美國，而並不能增加日本對美的優勢。日本要想對付美國，與其求之於德意軍事同盟之參加。毋寧求之於和英國作成妥協。日英要是作成了妥協。這纔是日本在遠東地位的最大保證；而日英妥協則又恰恰是與日德意軍事同盟衝突的。爲了要求日英妥協，纔有反英運動，反英運動的任務不在作成日英外交的破裂，而在作成日英外交的調整。而日本參加德意軍事同盟之說則不過是反對運動之另一手段的繼續，其任務亦不在作成日英外交的破裂，而在作成日英外交的調整。反英運動是隨時可以停止的，日本參加德意

軍事同盟的進行也是隨時可以停止的。因其如此，德意雖願意有日本參加軍事同盟的進行，持以與英法蘇軍事談判的進行相抗，但亦沒有把它看得十分認真。彼此都是在舞弄外交的姿態而已。

我們這樣子把英法蘇軍事談判與日本參加德意軍事同盟這兩件事的性質分析了之後，就能得出更可以證實我們的一貫見解的結論；歐洲的形勢現在並未因為英法蘇軍事談判在進行而已走上了決定的嚴重關頭，因其如此，英國對遠東也還不致於採取任何決心，或者是斷然與日本破裂，或者是徹底對日本妥協。英國因為對日本缺乏任何決心，她對美國的合作也就缺乏任何決心，或者是聯合美國斷然制裁日本，或者是聯合美國徹底作成平行調停。遠東的國際情勢還將拖延一個長長的時期，既無制裁，亦無調停；除了中日直接交涉，沒有第二條路可以打開這個僵局。

我們對於德蘇簽訂不侵犯協定的觀察

若 耶

德蘇已同意簽訂互不侵犯協定，德外長里賓特羅甫於今日赴蘇完成手續。對於這一段消息，讓陣線論者在那裏驚訝不置吧，我們來攷慮我們的。

第一，我們要指出，德蘇簽定互不侵犯協定乃是希特勒與史大林雙方的要求。希特勒爲應付二次大戰，必須拆散英蘇，這固然很明白；但史大林因爲畏懼戰爭，企圖親德以倖免於難，卻是更爲迫切。蘇聯的世界革命，到了史大林手上已墮落而爲外交的合從連橫；而歐洲政治家之處理對蘇關係，亦以訴之外交的合從連橫爲己足。希特勒之反赤，不過爲威脅史大林之尋求對德妥協；史大林之屈服於此種威脅亦非自今日始，此次史大林利用英蘇談判與英法蘇軍事談判以爲拉攏希特勒之手段，與昔年利用法蘇同盟以爲拉攏希特勒之手段，初無二致。現在陣線論者已在那裏說道：『德蘇妥協必係德對蘇作了重大讓步』，這是硬爭面子。事實上，這次外交的勝利者非爲蘇聯，而爲德國。德國對蘇放款一節，與其說是一種實惠，毋寧說是一種表示而已；而史大林之所欣幸，固亦不在二億馬克本身，而在二億馬克之爲信

物。一九三五年法蘇協定簽訂時德國亦曾貸款二億馬克，史太林說明二億馬克之價值云：『這一億馬克的貸款表示了德國已不打算進攻我們。』這次也一樣，不過是表示而已，算不得德國讓步。

第二，我們要指出，德蘇簽訂不侵犯協定不能保障和平，反而促進二次大戰的危機。這個協定給了希特勒以保證，使之敢與英法稱兵。現在陣線論者已在那裏替史太林辯護，說蘇聯前次以對日妥協結束張鼓峯事件，爲的是維持和平，這次與德簽訂互不侵犯協定，也爲的是維持和平。這是哄騙小孩子的說法。凡是有一點政治常識的人都可以知道，外交上的合從連橫是戰爭前夕的產物，並且是替戰爭做的準備手續，它只能促成戰爭，決不能防止戰爭。史太林現在正爲了『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安全，爲了轉移戰爭，不惜加速這個戰爭，以隣國爲壑，以全世界的民衆爲犧牲。然而蘇聯果能安全嗎？不，蘇聯決不能在二次大戰中保持中立。無論是簽訂英法蘇同盟德蘇不侵犯協定，都不過是選擇參戰的方面而已，不能迴避參戰。

第三，我們要指出，德蘇不侵犯協定之簽訂，其最直接之影響爲波蘭問題。有人謂德蘇簽訂了不侵犯協定，英法將軟化而放棄對波蘭之保證，這倒未必。波蘭之存在，乃是阻止德蘇作更進一步妥協之界石。有波蘭在，德蘇只能做到互不侵犯協定；要是德兼併了或者屈服了波蘭，蘇聯因受威脅更大，且將更屈服而簽訂德蘇軍

事同盟。以此之故，英法對波蘭一定要維持，可是對但澤則準備放棄，目前英法外交界的努力就是要把但澤問題與波蘭問題分開辦理。英國政界現正重申英國援助波蘭之決心。同時英國經濟使團領袖李萊則謂「但澤之於波蘭並無絕對需要。」此中線索，已極明白。這樣看來，德波戰爭還可以避免，但但澤歸德，則已為無可避免了。

第四，我們要指出，德蘇不侵犯協定簽訂後，蘇聯的注意重心仍在歐洲而不在遠東。現在陣線論者已在那裡自欺欺人，謂蘇聯在西方得了自由，將對日本干涉。這是無稽之談。蘇聯雖已簽訂不侵犯協定，但史太林仍在恐懼德國兼併波蘭或屈服波蘭，因為波蘭一被兼併或屈服，蘇聯將被迫與德簽訂軍事同盟，史太林如今還在極全力想要避免這個。英法蘇軍事談判雖告破裂，但在波蘭問題上蘇聯仍欲與英法作某種勾結。張伯倫聞將為波蘭問題提議召開國際調停會議，但德國決不願蘇聯參加談判，因為德國要是與英蘇平行談判，即無異驅使英蘇站在同一邊上。故但澤問題的命運雖已注定，但波蘭問題之處理將為今後歐洲外交之焦點，蘇聯也被捲入這個問題的困擾中，她絕不是已經自由了，她絕不會來干涉日本的。因為蘇聯不至於因為有了德蘇不侵犯協定就來干涉日本，日本所受該協定之影響亦並不顯著，遠東事件之發展將並不因而起何種重大的變動，這是可以斷言的。

我們對於平沼內閣辭職的見解

若 耶

日本平沼內閣昨晨辭職，這是因爲當前國際形勢的變動，使得日本有修正其外交政策的必要。今後日本外交的新對策，離開原來的崗位，角度會有多大呢？它的基調將仍然是近衛聲明原則，即將仍然以中日直接妥協爲主，只是運用中日直接妥協的外圍局勢，即運用對英美關係上將有所變動而已。新內閣的難題將在於如何變動這外圍局勢的運用，而不至於損及近衛聲明原則的完整性。

德蘇不侵犯協定是日本外交變動的界石。德蘇不侵犯協定的重量不在於它的本身，而在於它是一次世界戰爭逼近的象徵與信號。在德蘇不侵犯協定之前，日本對英，是顧忌她支持重慶政府，以拖延僵局來阻撓中日直接妥協之實現行程。在德蘇協定之後，日本對英，是顧忌她投奔美國，以促成調停來抵銷中日直接妥協之比重。顧忌英國支持重慶政府，是可以**用強硬手段對付**，用強硬手段可以使她退却。但顧忌英國投奔美國，是不可以用強硬手段對付的，你強硬，她就會更加投奔美國。在德蘇不侵犯協定之後，日本感覺麻煩的不在於英國從此將強硬起來，而在於英國從此將更加軟化，軟化到她完全喪失單獨處理對日關係的自信，而交給美國去

辦。這樣，日本的對英政策就不得不來一個修正，雖然尋求對英妥協的原則沒有變動，但尋求對英妥協的手段却不能老是那一套了。而且，對英妥協的價值，也不能不加以新的估計了。

其在對美方面，德蘇不侵犯協定之前，日本的政策是避免刺激，同時避免找她說話。但在德蘇不侵犯協定之後，日本對美關係轉入了正面，因為英國把她的那一份發言權交給了美國。華盛頓方面現在已宣稱日美關係將有迅速的調整，還有日本請求美國出來調停的空氣。日本請求美國出來調停是不可信的，但美國在想拿出她的調停來倒是這真的。現在輪到要把修正對美關係放到議事日程的第一頁上，這在日本是比修正對英關係要嚴重到無數倍，因為修正對英關係，左右是在中日直接妥協的外圍旋轉，而修正對美關係，則很有可能脫輻而去，使中日直接妥協不復成爲解決遠東問題的圓心。

這就是日本外交當前的困難，也就是這個困難逼得平沼內閣辭職。這個困難，就是正在迅速表面化起來，並且迅速強化起來的美國的推進其遠東政策，壓縮日本在處理中日關係的主動地位。新聞上台後，能否衝破這個困難，現在還很難說，因爲這不能取決於日本單方面的努力，同時要看中國方面的努力如何。但有一點是很明白的，即日本將以更艱苦的奮鬥來維持近衛聲明原則的完整性，並且以更急迫的

手段促其趕早實現。還有一點也是很明白的，即近衛聲明原則能否維持其完整性並促其趕早實現，對於中日的利害是共通的，因為在中日關係的處理上假使日本失去了主動的地位，中國亦將只有把自己的命運交給第三者去決定。所以日本外交當前的困難，對於中國可以是有利，也可以是有害，有利的是，日本爲要衝破這個困難，她將表示更大的誠意及早取得中國的平等合作，強化中日直接妥協這個圓心，以爲應付中日直接妥協的外圍形勢的主體；但要是日本的這個努力失敗了，而竟被這個困難所壓倒，弄到她在第三者之前狼狽不堪，那麼，中國也將連帶倒覆，因爲那時候第三者（最可能是美國）佔了日本的上風，將不是鋤強扶弱，而是將利用中日間的矛盾以結束中日戰爭，這種結束將只有把中日間的矛盾從表面壓到地下，成伏流，而更加深，使中日關係永遠糾纏不清，永遠不得確定。何況第三者的調停雖於中日均爲不利，但於中國更爲不利，因爲那時候英法美無論如何抑制日本，不過是逼日本打折扣而已，英國不必說，即美國亦已表示過九國公約可作若干修正。但整個說來，假使事情弄到這一步，復興中國，強化日本，以中日平等合作來復興東亞的百年大計，即根本無從談起了。這是中日兩國均應以同樣的努力來爭取的。

一切的關鍵在於中日直接妥協的提早實現。中日直接妥協能提早實現，以中日平等合作爲基礎的和諧的東亞能提早建立，以之爲應付外圍國際形勢的主體，則近

衛聲明原則的完整性可以保持。這不是日本單獨所能辦到，必須中國也作同樣的努
力。

遠東亟起自救！

若 耶

歐洲的局面現在確實很嚴重，會不會戰爭，要看英國能否辦到把但澤問題與走廊問題分別解決。要是德國僅僅兼併但澤，英國是可以讓步的；但要是德國想支配走廊，戰爭就會難免了。因為兼併但澤，於波蘭只是損失；而支配走廊，則等於支配了波蘭。英國不能讓德國支配波蘭，讓德國支配波蘭，等於讓德國支配二次大戰。但走廊問題是否可以原封不動呢？這也不然。英國早曾提議過一個解決走廊問題的折衷辦法，目前談判的焦點在此，二次大戰的邊沿亦在此。但德國將是否適可而止呢？德國運用德蘇不侵犯協定的優勢，是否以兼併但澤並且獲得在走廊的交通問題的解決為已足呢？她是否不再進一步把走廊問題的解決適合於她支配波蘭的方案，以為擴大軍事同盟，趁此一下子奠定戰爭的機構呢？這個現在都還很難說。

說歐洲這次一定會打起來，這是輕率，這樣說的人是沒有考察到目前實際談判的程序節目，沒有知道戰爭是制度的產物，但戰爭的爆發日期是要看外交活動，一根火柴掉了下去，或許就點燃了，或許沒有就點燃。

說歐洲這次一定不會打，這也是輕率。這樣說的人以為英國強硬，德國將讓步

了；或者以爲英國將讓步，以犧牲波蘭來買得平靖；又或者以爲英國警告，英德都將不敢妄動。事實上，德國沒有讓步的理由，因爲德蘇不侵犯協定給了德國以優勢，她爲什麼反而要讓步？英國將讓步。但不至於放棄波蘭，何況是否戰爭，將非取決於英國的讓步程度，而是取決於德國的進逼程度，是後者作成了前者的限界。至於美國的代表，雖爲英德所雙方重視，但戰爭不會等待美國決定其參加的方面之後纔爆發，美國在對外關係上，將保留其爲一個不確定的因素，一直到戰爭爆發，並且到戰爭爆發以後的若干時期。無論是希特勒或張伯倫，都不可等到處理如對美關係之後纔來戰爭。

所以我們只能說歐洲的局面現在確實是很嚴重，很有戰爭的可能，但不能一定。這樣的觀察，已够做我們制定國策的根據了。這個國策，就是要能適應當前歐局的高度危機，而且要使這個國策在推行中間即令歐洲來了戰爭，也只須變動步驟，毋須變動原則。

當前歐局的高度危機，其對遠東的影響是引起了日本的徬徨與中國的觀望。日本的徬徨由於一下子還沒有找到一個據點以之避免二次大戰的波及；中國的觀望則由於對二次大戰還存有若干幻想。但這種徬徨與觀望將很快的讓位給一種堅決的明朗的既定對策，那就是，加緊實現中日合作，以之爲應付世界危機的主體。

二次大戰於日本有害無利。有人以為大戰將使日本更加放肆，這是淺薄的見解，大戰如果來到，英國對遠東固然將更軟化，但日本如今的行動，並非受的英國的制限，而是受的美國的制限，是美國硬在那裏不讓日本代替英國在遠東的地位。大戰愈迫近，美國在遠東的對策將愈強化，英國在遠東的讓步將是對美，不是對日，因為對日讓步仍然不得解決。大戰帶來給日本的將是孤立。為要衝破這種孤立，她可以聯俄，或者聯英。但日本聯俄以與德意共同對付英國，只有投給美國以可乘之隙。她不敢這樣幹的。這只消把眼前的事實想一想就可以明白。德蘇不侵犯協定後，英國的地位正十分困難，而日本則並沒有被德意遺棄，倒是德意在以更大的代價拉攏日本，她為什麼不乘英國之危，反而更急的想和英國妥協呢？她不是怕的蘇俄搗亂，因為蘇俄正很願意和她簽訂不侵犯協定，也不是怕的英國的抵抗力，因為英國的地位正比以前更加困難，那麼，她所顧忌的是什麼呢？是美國，這難道還不够明白嗎？不但聯俄之路不通，聯英之路也不通。這也只消把眼前的事實想一想，就可以明白。英日圓桌會議正在接近中，美國來了警告：「英國只能在對日單獨妥協與美國的友誼中擇取其一」，並且廢止了美日商約，這樣英國就退出了圓桌會議。如今大戰愈迫近，英國將愈堅決的擇取美國的友誼，不擇取對日單獨妥協。日本聯俄之不能實現，是因為日本不敢；而日本聯英之不能實現，則是因為英國不敢。與

美國結合嗎？日本正是美國太平洋政策的第一個阻礙。留下來給日本的只有孤立。這種孤立，將使日本被逼聽命於國際調停來解決中日關係，須知過去國際調停之所以沒有來，與其說是由於日本的反對，毋寧說是由於英美關係之未確定，國際調停本身的不能形成。而且，這種孤立將使日本無法避免被牽入二次大戰。這就是日本徬徨的緣故。但日本的人民及其政治家應當知道，要衝破這種孤立，只有趕緊獲得中國的合作。

其在中國，須知歐局危急只有使英國更加在遠東退却，只有給予美國拿她自己的方案來調停中日關係的機會，不會援助中國抗戰，更不會爲了中國的利益纔來調停的。又如要二次大戰到來，則中國以其半殖民地的身份被夾在帝國主義再分割世界殖民地的戰爭中，其爲犧牲的對象，而非盟友，尤爲明白。中國在這個國際總危機襲來的今日，也只有趕緊獲得日本的合作，纔能有所打算。

中日平等合作，不但可以確立中日間的關係，而且可以確立日美間的關係。日本不能藉英國以與美國對抗，只有以獨立自主的中國爲友，纔能平衡日美在遠東的勢力對比，而中國之盡此任務，將非聯日抗美，而爲介紹日美間友誼。中日平等合作，不但可以合理的結束中日戰爭，不因國際調停而延宕，亦不因國際調停而被擱就；而且可以使遠東隔離二次大戰，做到局部的安定與繁榮。近衛聲明及汪先生

鮑電所提出的中日平等合作以復興中國，安定日本，振奮東亞百年大計，不但是適應德蘇不侵犯協定以之形勢，也適應德蘇不侵犯協定以後的形勢，也適應二次大戰來到的形勢。當前國際總危機的展開，並不需要變動這個中日和平運動的方針，只是需要更加趕快實現這個中日和平運動的方針。

歐戰的展開

若耶

現在還局限於德波英法四國的戰爭，將隨即展開而為全世界的戰爭。意大利將參戰，波羅的海國家的中立將被侵犯，土耳其也將沒有辦法中立，隨後則是蘇俄參戰，美國參戰。

目前意大利的中立，正和德國的表示不願擴大德波戰爭，一樣的不是外交而這是戰略。獨其任務為阻滯英法從這方面進兵，只好迂迴進攻東普魯士，德國燬滅波蘭是主力軍的日子，也就是意大利放棄中立的日子。但事實上意大利的放棄中立將比這還要早些，英法將逼得她這樣做。意大利正有許多迫切的要求，使她不能那麼清淡的自安於中立。她不是有求於德，而是有求於英法，這比上次大戰開始時意大利的對德奧與英法的關係要單純得多，並且確定得多，可是意大利對英法的要求，已超過外交的機能而終必訴之於參戰，這一點在本報前幾天的社評中已經說明了。爲了要爭取軍事上的先着，英法現在正催促意大利即刻表明態度，或者是參加英法這一邊作戰，中立是不够的。意大利的答覆將是參加德國那一邊作戰，現在延宕這個答覆的餘裕已經不多了。

英法對東普魯士迂迴進攻，爲了戰略上的必要，將沒有辦法不侵犯波羅的海國家的中立，因爲英法在海軍方面取的總是攻勢。報上已經有了丹麥的抗議，隨之而來的將是荷蘭瑞典等國家的抗議。瑞典與德國爲着特殊的經濟關係，英法將不能因爲瑞典的中立就放過這個關係。芬蘭則和英國的關係甚深。這幾個國家不久將被捲入旋渦，混戰起來。

土耳其的態度一天不明朗化，羅馬尼亞這些國家的態度也將一天不明朗化。這種不明朗化，毋寧說是於德國便利，給予德國在這方面獲得資源的便利。對於英法，却是利在這些國家的分化，有的助英法作戰，有的助德作戰，這樣英法在地中海東部可以確立一種明朗化的戰略，以完成有效的對德封鎖，並且與德國軍隊在這方面接觸。因爲這個原故，英法將將迫土耳其等國家表示態度，或者是參加英法這一邊作戰，或者是參加德國那一邊作戰，中立是不夠的。可是因爲蘇俄是幫助德國的緣故，土耳其這些國家到了非參戰不可時，加入德國那一邊的可能性要比較大些。

蘇俄的中立是不穩固的，一旦英法海軍控制波羅的海，而且擊破土耳其，蘇俄的屏障就會被拆倒，而且蘇俄對德國運輸軍火與原料就會被破壞，到了那時候，蘇俄將被逼加入德國方面作戰。蘇俄企圖學上次大戰時美國那樣坐收漁人之利，但美

國將給予英法以向蘇俄挑戰的勇氣。美國參加歐洲方面的戰爭將是最後的一個。只有美國纔有參戰最後的自由，蘇俄與日本都不能的。

大戰中各國動態

若 耶

德國進攻波蘭，第一個作尖銳的表示的是蘇俄。蘇俄集軍邊境，放出德蘇訂有秘密軍事同盟的空氣，負責方面並且正式警告英法。蘇俄爲什麼要這樣幹呢？她就是要把英法逼上梁山，要把德國戰爭急轉直下的變成世界戰爭，並且要把這場戰場的方向西移。蘇俄最顧忌的是英德在波蘭問題上成立妥協，這個妥協將不能防止戰爭，但有可能把戰爭的方向東移。所以蘇俄要作這樣的表示，她的戰略是成功了。可是實際上，德蘇秘密軍事同盟還是沒有的。

第二個值得研究的是意大利。意大利提議召開五強會議，用意只在延緩英法參戰，已毋須說；所要研究的乃是意大利將否參加德國這一邊作戰？我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意大利將參加德國這一邊作戰，絕不是因爲她對德國的信義或軍事同盟的條文約束，也不是因爲她不想利用機會對英法討價出賣；而是因爲她對英法講價絕無成交可能。意大利的討價將爲她在阿比西尼亞及阿爾班尼亞的勢力的確定，和她在西班牙的勢力的確定。這些在意大利看來，算不得笑兀的要求，但英法要是答應了這些要求，就會等於放棄整個地中海，在戰時讓意大利去負責地中海的

警戒，在戰後讓意大利去支配地中海的主權。這個損失在英法並不輕於被德國戰敗。英法要是答應這些條件，即使戰勝德國也成爲沒有意義了。英法讓步有一個限度，就是不能推翻她們的霸權的最後據點，她們是爲此而對德國宣戰，她們也將拒絕意大利的要求。但在意大利，她的要求是不能再減低的，幾年以來，她對阿比西尼亞用兵，對西班牙用兵，對阿爾班尼亞用兵，爲的是什麼？在她看來，再減低價錢是等於一無所得。意大利的地位是不可能中立的，她不能和英法成交，她將只有參加德國這一邊作戰。她將並不因爲上次大戰的教訓而猶疑，而且英法這次不一定能够戰勝。

第三個值得研究的是比利士。上次大戰比利士的中立是德國的阻礙，這次比利士的中立却成了法國的阻礙。所以這次德國特別表示尊重比利士的中立。德國在西方邊有了這道屏障，她可以空出時間先把波蘭擊潰。現在倒是法國在那裏煩躁，她既不能強迫假道以冒侵犯比利士的中立的指摘，又不能坐視德國在東線作戰佔了先着，她甚至於不能有和比利士商量假道的餘暇。結果將是怎樣呢？軍事上的理由整將顧不得國際法的指摘，很有可能這次會是法國侵犯比利士的中立。

第四個值得研究的是土耳其。前次英土商訂軍事同盟，土耳其答以須俟英法蘇軍事談判的結果而定。德蘇不侵犯協定成立，英土商訂軍事同盟之舉也就給打消了

。土耳其不能一面顧忌蘇俄一面與德國爲敵。如果中立做不到，她將被捲入德國這一邊作戰。昨天的哈瓦斯電說土耳其人士願參加英法這一邊作戰，不過是法國的希望與宣傳而已；實際上。土耳其的國策並不是由哈瓦斯電所說的土耳其『人士』來決定的。

第五個值得研究的也是最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美國一九一七年的參戰，事後甚悔其過早，而當時之所以不能再延遲的緣故，則是因爲美國商船累遭轟沉，輿論壓迫，以致政府失却了選擇時機的自由。爲了要保障政府的這種自由，一九三五年及以後幾次修正的中立法，都是根據這樣一個原則，即美國商人與交戰國作軍火買賣，所有危險應自行負責。這是給禁止軍火輸出開一道後門，但商人不得因爲遭了交戰國那一方面的轟炸與扣留，要求政府保護，催促政府爲此而戰。這樣，美國政府纔可以不受民情激昂的影響，不受輿論的牽制與催促，而保有選擇參戰時機的全權。這個中立法曾經應用於意阿戰爭，西班牙戰爭，中日戰爭，都收了効。這次只有更加慎重。有人以爲美國將修改中立法，以便利對英法作軍火輸出，假使如此，政府就得對商人可能遭受的危險負責，因而損害政府的自由了。美國政府決然要避免這樣做。現在已經可以看得清楚，美國的中立法將維持原案，假使修改，也只有加重「商業危險各自負責」的條文而已。

我們對歐戰的態度

若 耶

世界戰爭已經起來了。這個戰爭是帝國主義者再分割殖民地的戰爭。拿律師的觀點來分別那一邊是禍首，這一邊是自衛，或者拿牧師的觀點來審查那一邊是罪惡，這一邊是正義，都是無聊的。在史太林指揮下的蘇俄以前拿「民主和平陣線」聲討「法西侵略陣線」，我們並不因之而特別憎惡德意；在這同一個史太林指揮下的蘇俄現在忽然做了「法西侵略陣線」的朋友，倒在那裏警告英法了，但我們也並不因之至特別憎惡英法。我們主張過不與德意為敵，但我們絕不同情德意對任何國家開戰；而在另一方面，我們也一樣的不同情英法的參戰。路透社會消息說重慶政府大概將要表示同情英法，這不是我們的意思，也不是全中國人民的意思。

上次世界戰爭，中國參加協約國方面，適足以表示其為半殖民地酌奴性，隨宗主國為俯仰；現在我們無論如何避免在這戰爭中投奔任何主人。我們的努力是要隔離這場戰爭。上次世界戰爭，中日兩國政治家曾經主張利用機會把英國在東方的利益用武力搶回來，可是我們現在也不打算這樣幹。

我們不同情德國這一邊的戰爭行為，但我們並不因此而增進對英法的關係，或

更因此而改變對日本的觀念。我們也不同情英法的參戰，但我們並不因此而改變來合理手續收回第三國在華特權的觀念。

此外我們還須認識歐戰牽涉的方面將甚寬廣，它的持續將不會是短時間的，雙方的勝負是不能預料的。因為它牽涉的方面將甚寬廣，我們就須注意到要避免東亞被牽入漩渦，不是一椿輕易的工作，千萬大意不得。因為它的持續將不會是短期間的，我們就須注意不但要從速奠定東亞和平，並且要使這個和平方案能適應外圍的長時期國際非常局勢。因為雙方的勝負是不能預料的，我們就更加不宜於存有投機取巧的念頭。

我們現在有一點要顧慮的，就是日本雖然表示中立，但避免牽入漩渦的保證並不因此就算得到了。日本現在還想利用英日妥協遷就美國，來結束中日戰爭。但歐戰發生後英美日之間的妥協必依然陷於僵局，這個僵局當着歐戰的不斷激盪，將是富於爆裂性的，日本終且違反本願而被牽入漩渦，而東亞的安全也就從此完了。

要避免東亞牽入漩渦，第一不能讓東亞的現成僵局再延宕下去；而要想從速結束這個僵局，除了中日直接妥協是沒有第二條路。

隔離歐戰！

若耶

歐洲現在已經發生戰爭，這個戰爭將迅速傳播開來，將為世界的戰爭。全世界將沒有一處不被或遲或早的捲入漩渦，而當前的東亞則正站在這個漩渦的邊沿上。如何保全東亞，如何把東亞從這場戰爭隔離出來，乃是中日兩國的責任及其努力的方向。

許多人以為歐戰發生，英國將對日本作斷然的讓步，而以此來促成中日問題的解決。這種觀念，犯有兩點錯誤。第一：中日戰爭愈到後來，問題已愈從英日間的矛盾移轉到美日間的矛盾。歐戰發生，英國在遠東將更退却，美國卻沒有退却的理由。遠東問題已非英國讓步所能解決，倒是要看美國的態度如何。歐戰發生，可以抵銷英日間的衝突，但日美間的衝突却將更因此而從潛伏昇到表面，並且強化：而日英衝突則且將成為日美衝突的附加物，成為擴大日美衝突的部份。這一趨勢的進展是與結束中日戰爭完全相背的。第二：以日英妥協來促成中日問題的解決無論其為不能實現，即使實現了，也是於中國無利的，因為這個解決，將是以分贓的精神犧牲中國而得到的解決，其結果將會比慕尼黑會議更慘。

有些人則又有相反的看法。他們以為歐戰發生，日本將乘機滅亡中國，和平是完全無望了。這種觀念，也是錯誤的。錯誤在於，他們和前一批人同樣的把遠東國際關係看得過於單純，只以為關鍵就在英國的讓步；英國讓步國際調停就會被促成了，不然就是日本將要趁此滅亡中國了。實際上，日本的外交將必不能因為英國讓了步就能收効，日本的軍事亦必不能因為英國讓了步就能橫行無忌。何況歐戰發生，英國在遠東的讓步，將不是採取投奔日本的方式，而是採取投奔美國的方式，投奔美國，只有更加複雜化並且更加強化遠東國際關係的矛盾，日本怎能輕易作成妥協？又怎能趁此滅亡中國？

另外，有些人則又以為歐戰發生引起遠東國際關係的這種複雜化與強化，將有可能促成日本與第三國開戰。現在日本主觀的努力是在極力迴避這個，但終於違反本願的與英國戰爭起來，這個絕不是沒有可能的。由於日美衝突的在不斷增漲中，以致日英妥協僵化；而日美衝突又因為是潛勢的，無從形成一個固定的具體的據點以為正面處理，逼得日本只好繼續從對英交涉打開日英關係的僵局入手，這就會走到這樣一個結局：日最後投奔德蘇協定，跌入世界規模的反英戰爭。這裏的問題只剩下：那個敢挑釁？是英國還是日本？而照眼前的情形看來，似乎兩者都不敢。但決定的因素却不在這上頭，挑釁只是結果的一個部門而已。日英戰爭，既有可能，美國

又夾在裏面，這對於中國抗戰將會帶來一個新的前途的。

對於這個看法的前半截，即日本與第三國之間會有戰爭，這是很有研究的價值的，但它後半截的結論，以爲這樣子把中日戰爭牽入成爲世界戰爭的一部份，對於中國的抗戰爲有利，這却是大錯特錯了，要是這樣，中國的命運將只有走進另一個不可測的境界，以之最後的賭博而已。中日戰爭了兩年，還沒有得到一個結果，現在又來把它變成世界規模的帝國主義戰爭的一部份，而這個帝國主義戰爭又剛剛開頭，中國只有逼得把抗戰兩年可以得到的結果一概放棄，重新來等待這個帝國主義戰爭之不可測的結果到來，而把中國的命運列爲這個帝國主義戰爭的命運之一部份，這是何等妄誕，何等輕狂！

我們這樣子考察了各個角度之後，我們忠告中國人民及其政治家切勿對於正在到來的第二次世界戰爭發生幻想。並且忠告日本人民及其政治家要明白認識日本的行動一不當心就會把整個遠東捲入大戰漩渦。中日兩國人民及其政治家應當急起搶救，把東亞從歐戰隔離出來！看到歐戰的火燄已經起來，就該立刻來奠定東亞和平！

要想奠定東亞和平，不能期待英日單獨妥協，也不能期待英美對日平行妥協。要想奠定東亞和平，更不能依靠世界戰爭來得到。什麼都已試過了，什麼都只成爲

徒然的努力。事實的發展幫助我們的論點，說明了東亞和平絕不能以戰爭爲手段，也絕不能以外交的闖關連橫爲手段來得到。東亞和平只有以孫先生的大亞洲主義及汪先生的艱電主張爲努力的方向，纔能得到。

歐戰和重慶政府

雲 孫

在陣線論者的妄想中：以爲中日戰事必須跟世界大戰連接一起，日本在侵略陣線一面，中國在反侵略陣線一面，惡鬥一場的結果，當然是反侵略陣線大獲全勝，於是中國就在結總帳上面，取得了最後勝利。然而這妄想終於被眼前一切無情的事實所粉碎。中日戰事固然是冤冤枉枉地一直被拖到現在，失去了好幾次應當結束的機會，不幸得很，真個要被擠在這場惡鬥之中了。不過我們睜開眼睛，仔細看一看雙方的陣容，所謂侵略反侵略陣線云云，根本沒有這回事，而且算來算去，重慶政府將失去其立足的地點，隨着歐戰的動盪，愈加顯現它的分裂性。

這話從何說起？讓我們先確定一下重慶政府的身分：重慶政府口口聲聲說是和英美法蘇的民主陣線或反侵略陣線站在一條戰線上的。一方聯蘇以自保，一方聯英法以自重，一方親美以自娛。要想藉英美法蘇錯綜的勢力牽制着日本，要想在國際的夾縫中，實現自己的妄想。然而再讓我們看一看歐戰今後演變的形勢將如何：目前戰局雖局限於德國與英法，但是這戰事在空間上將逐漸擴大，而在時間上將繼續延長，在空間擴大的廣度上，在時間延長的長度中，我們最應當注意的是美日蘇義

四國的動向。讓我們姑且假定蘇義兩國將加入德國方面，而美國則加入英法陣營。日本的向背一時還看不清楚。因為日本要是加入在德蘇方面，那末它的海軍將替別人在太平洋中作戰，這犧牲的巨大足以使日本躊躇。要是它加入英法陣營，那末它的陸軍將在滿蒙一帶對付蘇聯的侵入，這在中日戰事未結束以前，日本總想竭力避免的。所以日本在環境未十分逼迫它捲入漩渦以前，它斷不會輕率加入任何一面。不過到了四面逼攔來可它無法躲閃的時候，它總是要加入一面的。

我們先假定日本加入英美方面，那末重慶政府天天喊着跟隨英美的一部分，將自動和日本妥協，而與共產黨脫離，使重慶政府分裂。再假定日本加入德蘇方面，那末共產黨將聽從蘇聯的命令，向日本『屈膝』，而和傾向英美的一派分離，仍不免使重慶政府崩潰。所以說來說去，在歐戰的進展中，重慶政府勢不得不壓在自己變着的這塊國際大石頭的下而，而被壓得粉碎。

陣線論者的抗戰必勝理論，一個是希望日本的崩潰，一半是妄想國際的變化。現在日本崩潰的跡象雖遲遲未顯，而國際的變化却出現了。可是這變化的發端，偏偏沒有符合陣線論者的估計。當初陣線論者的估計以為世界大戰的陣容中國和日本是宿命地處在敵對方面，不料在大戰序幕揭開的今日，因為德蘇的勾結，使他們預料的陣容全部推翻。這一幕抗戰的演出，可說是以喜劇始而以喜劇終。何謂以喜劇

始？西安事變不是活靈活現的一齣喜劇嗎？何謂以喜劇終？打來打去，打在一條陣線上，弄得手忙腳亂。啼笑皆非。這不是又是一齣喜劇嗎？

從前有人說：以國事爲兒劇。現在陣線論者和重慶政府，真個以國家的命運爲兒戲。幸而汪先生在上海方面領導同志，起來做搶救工作。但願在歐洲戰火未擴以前，完成『拔火弄』的應急處置，從速奠定中日的和平，確立東亞的地位。使東亞一角不再受戰火的焦燃，則國家復興的餘力猶存，覆亡的慘禍可免。

歐戰與中日和平

若 耶

1111

歐洲現在已經開始戰爭，英法都將參加。這個戰爭，原非出乎我們的意料。香港南華日報從去年九月到今年三月關於德捷問題的社評已曾指出：捷克問題不會引起戰爭，但它是一塊界石，越過這塊界石，外交即為無用，戰爭即為不可避免。兩個月前，更曾指出在歐洲政治地圖上波蘭的地位與捷克的地位不能相提並論，英法不保證捷克，但必保證波蘭，而且從捷克問題走到波蘭問題的過程當中，指出意大利在地中海去路的被截阻及其在中歐地位之遭受德國控制，加強其對德國的投靠，而作成德意軍事同盟，更從土耳其羅馬尼亞諸國的中立地位的突遭震動，到處奔跑的這種動態當中，指出其為戰爭的風暴快要到來的徵兆。而本報復版以來關於歐洲問題的社評，則更指出，希特勒要是決心發動戰爭，他必起來干預英法蘇談判，從英蘇當中拉攏一個。其後德蘇簽訂不侵犯犯定，我們更曾指出這個協定會促成戰爭，指出該協定是戰爭到來的象徵與信號；並且事前指出英國將不因該協定而放棄其對波蘭的保證，今後戰爭能否避免，要看英國能否做到把但澤問題與走廊問題分別解決，她對但澤可以讓步，但不能避免德國支配走廊，因為讓德國支配走廊等於

讓德國支配波蘭，等於讓德國支配大戰。英國已經非正式表示但澤對於波蘭沒有絕對需要，但德國利用德蘇不侵犯協定的優勢是否就此爲止，是否不進一步堅持支配走廊以爲支配波蘭的要求呢？當時就會提出這樣的疑問，認爲未樂觀。果然，在英國非正式表示但澤對於波蘭沒有絕對需要之後，德國建議十六點當中，却堅持對走廊的要求，就在這一點上爆發了戰爭。

防止世界戰爭是在我們能力之外，我們嚴密考察這個戰爭的進展方向及速度，只是爲了警告中日兩國要趕快在世界戰爭到來的前頭結束中日戰爭；『要和得快』，就是我們的口號。我們的努力只是要避免把中日戰爭弄成世界戰爭的一部，並且要以東亞的局部和平限制世界戰爭的廣度與深度。不幸重慶政府終於不知道和平的時機，又不幸日本雖然知道個時機但是缺乏斷然的處理。

爲了要避免中日戰爭被世界戰爭衝盪以去，爲了要想趕快實現和平，在日本有了阿部內閣的出現。阿部內閣的主觀努力，是在調整英美蘇關係，以便利和平之實現。共和平沼內閣的調整英美蘇關係的政策的不同點是在，平沼內閣企圖日英單獨妥協，撇開美國，對蘇關係則任其不確定，但求避免刺激。阿部內閣則承認不能撇開美國，而以通過英日妥協去獲得美國的諒解，其對蘇俄，則尋求較之以前更爲確定的關係，但對蘇聯關係之性質及分量的確定則須視日本對英美妥協的成就如何而

定。前內閣力謀日英單獨關係，以爲強化日華直接妥協的手段，但現閣不得不承認須對英美作平行妥協，對華原定政策的推進的強度却因此而受到了影響。本報社評「我們對於平沼內閣辭職的見解」即曾指出「新閣的困難將在如何修正對於中日直接妥協的外圍國際關係而不致損及中日直接妥協的原則」。阿部着手組閣中間，即曾遭遇此困難而幾致流產，其後阿部明朗表示始終維持近衛聲明原則，始得一致擁護。但阿部就職後發表外交政策談話，對於近衛聲明原則的推進的手續與步驟，將更爲慎重，則是事實。

但我們的看法，阿部內閣的實際推進其外交政策較之其發表外交政策談話將要複雜得多，困難得多，很有可能阿部的外交政策談話將會來不及實施，就遇到再修正的要求。這個原則就在歐洲的戰爭來得太快，使他措手不及。本來平沼內閣的外交政策是大戰尚未到來時期的作品，阿部內閣的外交政策是大戰快要到來時期的作品，可是到了大戰已經到來的時期，阿部內閣的外交政策也就會和平沼內閣的外交政策一樣成爲過去的東西。這一點，完全可以拿日美關係的變動來做具體的說明。在大戰尚未到來的時期，美國在遠東的地位的比重還不能有具體的增進，日本可以假裝看不見，而英日單獨妥協也就是在這上頭找到了盤旋的餘地，而平沼內閣的外交政策亦即以此爲背景的。在大戰快要到來的時期，美國在遠東的地位的比重，纔

有了具體的增進，使得日本不能再不加理睬，可是增進的程度還不至於對日本具有壓倒的優勢，這種增進倒是恰好作成了日美之間的一個平衡，作成了日美之間的妥協的交點，不過日美間的妥協還是要借用日英妥協做它的外殼而已。阿部內閣的外交政策即以此為背景的。但到了大戰已經爆發的時期，美國在遠東的地位的比重的增進，就會重新打破日美間的這個剛剛達到的平衡，而使妥協發生困難，使剛剛形成的阿部內閣的外交政策馬上成爲無用。那時候日本將怎麼辦呢？如果是聽其自然發展，那就很有可能走到日美衝突，甚至於日美開戰。現在來說日美開戰，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歐戰爆發之後，英國把遠東交給美國去代理，有如前次歐戰她把遠東交給日本去代理那樣，這就會是很有可能了。做到了這一步，日美衝突的表面化甚至於發生戰爭，也就會是很可能的了。許多人以為歐戰爆發，英美將斷然對日本讓步以促成妥協，這是錯誤的。事實將完全相反。歐戰爆發之後，隨來的影響則首先將是遠東殘剩的舊均勢的最後破壞，而新均勢的產生則尚須經過一場較之兩年來的中日戰爭更爲劇烈的陣痛。日美衝突將難免表面化，日本對華戰爭的現成局面將來不及解除。這裏只須伸說一點，即那時候的日美衝突的表面化將是借用日英衝突的表面化爲舞台而表現，有如目前日美企圖妥協是借用日英妥協爲舞台而表現，而其終極，則爲名實俱符的走到日美正面衝突。遠東局勢演變到這一步，就爲一味期

待國際調停的重慶政府所完全意想不到。而正在打算遷就國際調停的阿部內閣，也將爲之吃驚。遠東局勢演變到這一步，將使中日兩國的國運完全爲其政治家的失策所斷送。

但這只是一個可能的前途，即以遠東局勢任其自然發展爲前提。要是中日兩國能警覺這個危機，而講求準確的對策，則未始不可以找出一個完全的前途。這個準確的對策就是中日兩國趕快作成和議，並且徹底促成和議。遠東局勢的安定，有待日美關係的確立，而日美關係的確立則只能在中日問題的合理解決中纔能得到。日本不能以日英單獨妥協來解決日美關係，也不能遷就英美平行調停來解決日美關係，更不能以與蘇俄結成諒解來解決日美關係。她只能以中日合作來解決日美關係。怎樣纔能得到中日合作呢？日本不能要求中國投降來獲得中日合作。這在抗戰初期已經試過了。她也不能和英國分贓來獲得中日合作，這從去年一月十六日聲明以後到近衛聲明以前這一段期間也試過了。她更不能和英美平行妥協犧牲中國來獲得中日合作，這個雖還沒有試過，然而正可不必再試了。日本要想獲得中國的合作，決不能以獨佔的形式，也決不能以分贓的形式。日本只有尊重中國的獨立自主，與獨立自主中國爲友，依據孫先生的大亞洲主義來修正她的東亞秩序，纔能增進東亞在國際上的比重，而日美間正常關係的確定，也就容易得到了。說來說去，日美衝突

是在於日本想獨佔中國上頭，不然就在於日美在華分贓上頭。日本果能放棄其獨佔或分贓的打算，而以獨立自主中國爲友，並以之爲媒介，則日美衝突將自然泯滅，遠東局部和平可以保持。

歐戰與和平運動

歐戰發生，在中國思想界引起了極大的混亂，第一是防共的問題，第二是遠東能否中立的問題，第三是遠東如果牽入漩渦對於中國是否有利問題，第四是抗戰兩年所作出和平運動是否因為歐戰發生而被推翻或需修正的問題。

關於防共問題，有人以為德國和蘇俄做了朋友，而且或許還會有日蘇不侵犯協定出現，防共問題已經失去支點，失去對象了。這種說法是錯誤的。汪先生的艷電對於這一點說得很明白：「防共目的在防止共產國際之擾亂的陰謀，對蘇邦交不生影響」。把共產國際與蘇俄分別看待，不但是汪先生的見解，也是歐洲政治家的見解。德國不必說，意大利是反共的，但她在早幾年一面與蘇俄簽訂親善協定，一面與德國簽訂防共同盟，並不相妨。不但德意如此，英法也何嘗不如此。英國保守黨內閉痛惡共產主義，然而進行英蘇談判。法國達拉第內閣對待共產黨可算嚴厲極了，然而一直保持法蘇軍事互相協定，並且參加英蘇軍事談判。增進對蘇關係，到蘇俄拒絕為止。若說防共的意義因為有了德蘇不侵犯協定被取消了，豈不是早在英法蘇意簽訂親善協定時就該被取消了？若說防共的意義因為歐戰發生被取消了，

豈不是早在英法德意因爲阿比西尼亞戰爭西班牙戰爭而衝突時就該被取消了？這次固然是法西斯國家拉攏蘇俄作戰，但要是民主國家拉攏蘇俄作戰呢，難道就是英法和共產主義合流了嗎？獨裁國家是反共的，民主國家也是反共的，不過形式不同。我們反共，在實質上不是與德意共通的，即與英法也是共通的，但在形式上原不必拘泥德意的形式。防共的實質是防止國際的國內的共產主義，至於藉防共來做合縱連橫，不過是它的副作用。我們主張防共，本來不是拿它來做合縱連橫的，我們向來認定弱國而講合縱連橫是只有做尾巴，被擠死。我們主張防共，乃是爲的防止國際的國內的共產主義。帝國主義國際的合縱連橫由它怎樣變化，對於防共的實質還是無損的。

關於遠東能否中立的問題，答案是要看中國的對策如何，也要看日本的對策如何。假使中國拒絕與日本直接妥協，日本只好去找國際調停，但國際調停必因歐戰而更錯綜，更難產，難產的陣痛因爲感冒外邪而被捲入大戰漩渦，這就很有可能了，又假使中國已能負責與日本直接交涉，但日本企圖利用歐戰，以致損及近衛聲明原則的完整性，而挾持國際調停來操縱對華直接交涉，則其結果將只有助長重慶政府對國際的倚賴，繼續阻礙和平，而日本之挾持國際調停終必失敗，以參加大戰爲最後冒險。如果事情弄到這一步，遠東就不能保持中立了。但這不是沒有辦法避免

的，要是中國有了負責與日本直接妥協的主體，日本也始終保持近衛聲明原則的完整性，則和平可以實現。英美不能阻礙中日和平，只能拒絕和平實現後的投資以爲影響和平的手段。但歐戰發生，世界經濟的規律有了變化，中日兩國只能夠實現和平，即使沒有外資，要開發是難，要恢復則比較容易。何況拒絕投資將不過是一時，而非久遠如此。現在日本以遷延戰爭來做要挾投資的手段，這是看到意阿戰爭及西班牙戰爭沒有先把投資問題弄妥，戰爭結束之後還是沒有辦法。但現在的情勢不同。現在歐戰發生，中日只要能夠和平，兩國的外交軍事一致，將使英美有隨時答應投資的必要。所以說日本與其以延宕戰爭來做要挾投資的手段，不如以結束戰爭來使得英美非投資不可。以延宕戰爭來要挾投資，在平時是可以，在歐戰的形勢之下却不適用，反而危險，因爲在平時延宕戰爭可以刺激外交，在歐戰的形勢下再來延宕戰爭却會激成戰爭的。

關於遠東如果牽入大戰漩渦對於中國是否有利問題，答案是，不但對於中國無利，對於日本也無利。遠東如果牽入大戰漩渦，勝負之數就須委之於大戰的全局的命運，不能以中國的國力或日本的國力來估計。幸而大戰的結算中國是參加在勝利的一邊，戰時所受損失將如比利士，戰後所遇困難將如帝俄。如果失敗，那是完了。其在日本，假使大戰的結算她只參加在勝利一邊，她的地位將如法國，上次大

戰法國幸而戰勝，但法國的地位較之戰前却低了一級，戰前的位次是英法美，戰後成爲美英法了。如果失敗，日本就會變成凡爾賽會議中的德國。參加世界大戰無論勝敗都是損失，只有第三者可以沾益。中國與日本已經賭博了一場，現在萬萬不可再來一次更大的賭博。

關於和平運動是否會被歐戰所推翻或修正的問題，答案是不會的。現在中國要是再抗戰下去，只能捲入世界大戰的漩渦，而捲入大戰漩渦又是無論勝敗都於中國無利的，歐戰不但不能推翻和平運動，反而更加證明了和平運動的準確性。因爲重慶政府的依賴歐戰，與日本的企圖利用歐戰，今後和平運動將更加困難，但這個困難是只要中日兩國的政治家改變其政策就可以消除的。歐戰不但不能推翻和平運動，也無須修正和平運動。如果要修正，那也只在和平實現後的建設方案而已。

和平運動的把握

若 耶

中國是戰敗國，我們憑什麼來爭取平等的媾和呢？我們憑的是下面這個真理；只有媾和纔是中日兩國的出路，只有平等纔能實現中日兩國的媾和。歐戰發生，由於中日兩國政治家的新的幻想與投機，和平運動或許會受挫折，但這種挫折將只有更加證明和平運動的準確性。如果中國的命運是注定了要亡國，日本的命運是注定了要崩壞，東亞的命運是注定了要做非洲第二，那是沒得說了。否則，要是中國還有復興的日子，日本還有振作的日子，東亞還有安寧的日子，那麼這個復興，這個振作與這個安寧，是只有從和平運動的實現當中纔能誕生的。我們不相信幾年來的中國，明治維新以來的日本與整個東亞的命運，會因中日兩國政治家的無知與不負責任而毀於一旦；我們不相信中國的日本的與東亞的命運會如此脆弱。相反的，我們相信中日兩國與東亞的歷史的輪子將依然進行，把這批無知與不負責任的政治家軋碎，擰開，而不被這批無知與不負責任的政治家所阻滯而中斷。是這一段偉大的歷史前程保證了和平運動的成功，而我們的把握也就是建立在這個信念之上。

我們相信和局一定會實現，所以我們相信這個和局一定是平等的，因為不平等

的是和局一定不能實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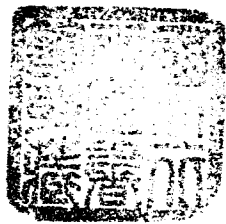
中國人目前最擔心的是亡國，因為抗戰不能救亡，所以要和平；要是和平仍然不免於亡國，和平要來做甚？這裏請日本人不會誤會，以為中國人既然最怕亡國，日本就可以拿亡國來威嚇，逼成不平等的和局。這種想法等於什麼呢？等於中國人看到了日本最怕延長戰爭，中國就可以拿延長戰爭去威嚇，以取得無條件的和平。中日雙方要是這樣想法，那是只有同歸於盡的。中國固然最怕亡國，但很知道不會是亡於日本；日本固然最怕延長戰爭，但很知道不會是敗於中國。雙方都有弱點，然而雙方都無所施其威嚇。

中國人目前最關切的是復興中國，因為知道中國的命運是與日本關聯的，所以更關切到復興東亞。要是中國領土主權之獨立完整不能保持，國家不成其為國家，還有什麼力量來分擔復興東亞，還有什麼心思來商量復興東亞？孫先生有過一個很恰當的比喻！民族主義好比窮人的一根扁担，世界主義則是藏在扁担裏的一張發財票，要是先把扁担丟掉，發財票也就一道被丟掉了。這個比喻止可用來說明今日的民族主義與復興東亞的關聯。中國人民和窮人寶貴扁担一樣，寶貴民族主義，這種心理是日本人民在明治維新前後一段期間曾經同樣體驗過的。現在日本是強盛了，她的努力已經超過民族主義了，但她應當認識中國還是窮人，要窮人就來丟掉這

根區担是萬萬做不到的。

中國現在的處境正如戰前的土耳其。當時因為帝俄繼續逼害土耳其，結局弄到俄土兩國抓住各人的辮子一同跌入世界大戰的漩渦。現在日本要是繼續逼害中國結局也會弄到中日兩國抓住各人的辮子一同跌入世界大戰的漩渦。一同跌入世界大戰的漩渦的結果，中國或許遭到和土耳其或塞爾維亞那樣的命運，日本或許遭到帝俄或奧國那樣的命運：對於中國有什麼好處？對於日本又有什麼好處？

汪先生領導的和平運動就是要防止雙方的這種同歸於盡的做法，替雙方指出除了這種同歸於盡的做法之外還有一條共存共榮的大路，那就是實現中日兩國的和平，並且指出只有保持中國領土主權之獨立完整，纔能實現中日兩國的和平。室伏高信先生有一句話說得很好：日本應當去找中國的愛國者講和。日本只有拿這樣的眼光與誠意來認識汪先生領導的和平運動，中日兩國纔能接近。



廿八年三月十八日
贈者不詳

572

C

3.09

9/5